

全盤西化言論集

引言

自從今年一月陳序經先生的演講詞『中國文化之出路』在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欄發表之後，跟着即爆發了一場文化論戰，想讀者也還記得罷。本來事理愈辯而愈明，尤其是「西化」這個問題——一個範圍極廣濶而且性質極複雜的問題，更急待『不厭求詳』的討論，可是現代青年欄爲了該報改組和其他的原故，無形中便將這個論戰半途截斷，使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們想更來說個明白也得不到機會。

全盤西化這個主張，在今日之中國只是一個最『後進』的思想，她引起一般折衷派和經濟史觀派的批評和懷疑，原是意中和必有的事。爲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本刊二十二卷第五期也曾登載過好幾篇關於討論和說明這個主張的文字，雖然這還未算得詳細和透澈。現在我們爲了彌補這個缺陷起見，特再徵集關於這個問題的文字，和選出已在現代青年欄發表的幾篇比較重要的言論，彙編成一小冊，顏曰『全盤西化言論集』。俾讀者可以明瞭我們主張全盤西化各方面的理論的系統，和易於比正。同時算作我們對於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個小結束。

就現代青年欄上那場論戰來講：要算張謇先生，對於我們的主張是最先而且是最激烈反對的一人。不過，反對儘管反對，理論是否健全是另外一件事。張先生對於西洋文化之

認識的畸形和不澈底，及其折衷理論之矛盾與辯論態度之失檢，我們這裏的文章也有直白指出來的。在我們的答辯文字裡，也許有過火的地方的，我們現在也照樣刊載，以存當日辯論的真相。我們固不是單爲了張先生個人的謬誤而去批評的，只因爲在今日中國社會裏，其思想和態度之類似張先生者，正不知有多少人！

我們主張全盤西化，我們是否叫中國人只會穿西裝，吃大菜，住洋樓，和其他享樂與玩耍的西化活動，祇要讀者細心一讀這本小冊子，就可以十分明白了。

我們的目的：原是坦白地指出那現在最爲流行的『皮毛西化』及其他折衷調和辦法的不澈底與危險，而爲今日中國尋求一條較爲實際，較爲根本，較爲美滿，和最爲適應時代所需求的文化出路，使中國民族的命運可以得到延長和發展。

我們主張努力全盤西化，意在斯乎！

呂學海 民廿三，黃花節，於『南大青年』編輯室。

全盤西化言論集

目錄

中國文化之出路·····	陳序經博士演講
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	梁錫輝 筆述 (一)
附錄	陳序經 (一八)

張磬：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	(二七)
------------------------	------

讀『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後·····	呂學海 (四二)
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再答張磬先生·····	陳序經 (五五)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和澈底的西化』的批評·····	馮恩榮 (六三)
評中西文化討論的折衷派·····	呂學海 (七一)

目錄

二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	陳序經(八六)
我們要一個新文化哲學·····	盧觀偉(二三)
附錄文化論文要目	

中國文化之出路

陳序經博士演講
梁錫輝筆述

（此文見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欄八二六，八二七期）

——民廿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晚在中大禮堂講詞撮畧——

『把世界文化迎頭趕上去

把中國民族從根救起來』

錄該禮堂壁上之對聯與本文題目同證

（一）

今晚兄弟很喜歡得來和諸君研究中國的問題，尤其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想着把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從文化着手；因此今晚兄弟特別拿出「中國文化之出路」這個題目來和各位作一簡短的討論。爲中國的

前途計，我們要給它尋找一條出路。關於中國文化底主張，大約可分作下列三派：——

(一)復古派——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的

(二)折衷派——提倡調和辦法中西合璧的

(三)西洋派——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是特別主張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國文化澈底全盤的西化。現在兄弟先來給第一第二兩派下一個批評，然後再提出主張第三派的理由。

(1)對復古派的批評

復古是中國人數千年來的傳統思想。在思想繁盛的春秋戰國・除法家外，都是趨向於復古的。他們以為自五帝以至三王五霸，一代不如一代，便說上古是黃金的時代・復古是最好的辦法。最近張之江也以爲拿大刀便可以抵禦全副新式軍備的日本兵。這其實於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不可行。所謂「固有」的文化的觀念，只在中西文化接觸前有之；追接觸一經發生，馬上便成功了一種新局勢，新要求，也使沒有所謂固有文化的存在。結果，能

適應的，便可生存；不能適應的，便歸淘汰。那時它們好像雙雙並立，其實是雙雙必需，而爲兩方所必需的共同品。所以在理論上保存固有文化這句話是說不通。卽在事實上，也是不對。由燧人氏以至神農氏，伏羲氏，軒轅皇帝，歷史上的記載，都是一代比一代進步。同樣，唐虞夏商周，以至唐宋元明清，每一朝代的文化，未必低過從前。恐怕還有人以爲復古，是復返古時的道德。其實道德只不過是全部文化中的一部分，常常要受文化的各方面所影響。每一時代，每一地方都有其道德；所以道德這種東西，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單就婚姻制度來說，西藏是一妻多夫的，中國是一夫多妻的，西洋是一夫一妻的；因此各處的道德觀念也因之而異。以前有殺嬰的風俗，現在則以爲不對。希臘時代以爲蓄奴是合法，現在已把這種制度取消了。社會進化。而人類的道德也便跟着改變；所以今日中國的道德，也未必淪落。從整個歷史來看，還是進步，而并非和常人所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一般。

復古派的結晶，孔子是其代表。中國向來只有一種文化，可以叫做「孔家化」。爲的是

孔子既上承唐虞三代的餘緒，又下爲中國後世文化的表率；故有謂「孔子一身，直爲中國政教之原」。他的「一以貫之」之道，可歸納於忠恕兩種觀念之上，孔子之講忠孝；外人也非沒有。現在有人把孔子來提倡。其實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道德，亦值得去提倡。孔子說要忠君，可是現在已無君。所以像孫先生所說忠，是要我們去忠於國家；這顯然是與孔夫子所說的不同。不但如此，我以爲孔子的學說，是有很多的弊病的，譬如他說：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個信條，一經宣佈，則無論誰都要信仰我的道；不相信我所說的，就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迨後孟子之所謂異端，大都是指楊墨，而詆墨氏「兼愛」是無父，楊氏「爲我」是無君。這樣的惟我獨尊。排斥異己，使中國的思想沒由發達。這種盲目排除異端的态度，推演下去便成爲排外的心理。凡在中國以外的，都作他們爲夷狄；這是由於陳舊的思想與頑固的保守所致。結果不特東洋本土的文化爲其桎梏，卽西洋外來的文化，尤爲所排斥，卒至釀成八國聯軍入京之慘禍，而使中國日後大受痛苦。所謂復古就是復孔，也就是尊

孔；尊孔便要排除別的學說。除了孔子之道，是不容許別的東西。若在事實上做不到而要採納別的東西時，他們還是不肯率直地起來承認。比方孟子所說的「民貴君輕」的學說，好像是受過老子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的影響；然而他却不明白的說是從老子採過來。我以爲這不外是因門戶之見太深，并且爲了要尊師的緣故，便說是孔子儒家之道，而置老子於不提；又好像陸象山之於佛老清靜無爲之說，不只承認其價值，還更身體而力行。可是他仍聲聲自稱爲儒家的忠實信徒。在我們今日看來，他豈不是很不忠實嗎？至於一般所謂孔教徒們，坐着一九三三年的汽車，住着高大洋樓，食着英法的西餐，而惟有口則說着孔子之道，比起顏回之在陋巷而不改其樂，甘願過着一簞食一瓢飲的簡樸生活，自己也要愧死，用不着我們來批評。

近世的復古言論，在國內可算以梁漱溟的勢力爲大。在國外則以辜鴻銘的影響爲多。惜現因時間關係，不能和諸君作從長討論。總之，我們可以從現在的趨勢看來，委實不能容許我們去復古。爲什麼我們偏要復古？復古不但是去做古人的奴隸，簡直是要去再過茹

毛飲血，穴居野處的生活！我們忘記了這二三百年來，我們太落後了！我們太不長進了！落後惟有直追，不當躊躇退後；不長進惟有對着現代世界的文化迎頭趕上，不當開倒車的去復古！我嘗說假使滿清能於入關之後，循着明末的趨勢，盡量的去採納西洋文化，澈底的加以創造與發展，則今日二十世紀的中國，實不難與歐美齊驅並駕。無奈清廷只顧目前的苟安，而昧於世界潮流之所趨，終至於失敗！

(一)

(2) 對折衷派的批評

第一條路復古派的辦法，既行不通；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跑向第二條路——折衷派，調和的辦法去呢？這派的主張，固然是調和其它二派，但它的內部，并非一致。關於這派的意見，約有下列七種：——

(一) 道和器 這種主張是以「西洋之器，調和中國之道」。曾國藩以爲西洋最好的是機器，便極力主張發展西洋的機器，而薛福成與李鴻章却是一樣以爲中國之道也可拿去宣傳

給西洋人。其實每一種器，必由一種道而來。設若中國之「道」，是要靠西洋之「器」來保護纔能殼存在，試問還有什麼存在之價值？從科學之道，原則，和信仰，而得到物質之器；中國無此「道」，安能得此「器」？一直到了甲午之役，戰敗於日本以後，方纔恍然明白東方的「道」與西方的「器」的調和是錯誤的。

(二)體和用 這種主張是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張之洞在光緒廿四年所著的「勸學篇」便是主張先以中國的學問爲體，纔去看看西洋有什麼所長，然後拿過來應用，此種論調，本來已成爲過去的陳跡，現在已沒有人相信。再者，此種主張，好像以中學爲機體，西學爲功能。又有些以爲中學好比一張檯，西學好比一張椅；這顯然是很不通的。好像耳之體不合眼之用，眼之體不合耳之用一樣。體和用是不能夠調換；因爲無論那一種機體，都同時有它的功能；體和用是沒法分得開的。

(三)物質和精神 這種思想，是以爲中國的是精神的文化，西洋的是物質的文化。主張這種思想的人，以爲西洋的物質固有可取，但是其精神文化則不及我們中國。所以我們

一方面要保存我們的精神文化，他方面要採納西洋的物質文化；這種折衷辦法，可算是最普通的。我們對這種見解的批評，是以爲所謂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不外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爲的是物質文化所表現之處，便是精神文化所寄存之處。視察其精神文化，同時也可懂得其物質的文化。它們的關係正如一個人的肉體和他的靈魂的關係，兩者處處都是互相爲用，而不可以分開的；縱能分開，也不能使我國非物質的精神生活，和西洋的物質文化相溶。

(四)動和靜 再有些人把文化分作動的文化 and 靜的文化。這種見解，是很錯謬的。他們不曉得文化的本身是動的而不是靜的；所以沒有不進不退的文化。假如文化是真個靜止的，那麼，我們一定不會有演進。什麼是靜的文化？靜的文化，只有是死的文化。但死的不能說得是文化。原始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今日我們席豐履厚，珍饈百味；這都是由文化的變動演進而來。再者，他們說中國人鄉村生活是安靜的，所以中國的文化是靜的文化；西洋人城市生活是嘈雜的，所以西洋的文化是動的文化。這種說法，也是同樣的錯謬。

不信，請看我們中國的人三數個聚在一起，便成了個墟，街道也喧囂擠擁了不堪。但西洋的人許多同住在一層樓，他們却也很恬靜，馬路上也是秩序井然；所以把中西文化，分別做動和靜的兩種，是不對的。

(五)動物和植物 更有些人把文化分作「動物」和「植物」兩種。這種見解，也是不對的。他們的看法，以爲中國人的主要食品是五穀菜蔬，因此中國的文化是植物的文化；而西人所喫喝的是牛肉牛乳，因此西洋的文化是動物的文化。照此法看來，難道中國南方畜牛，便說南方是牛的文化，北方牧馬，便說北方是馬的文化？況且植物是無意識的，而動物是有意識的；這樣，豈不是動物文化較植物文化爲高一層嗎？畜牧民族的文化較之農業民族的文化爲優一等嗎？

(六)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 這是南京亞細亞文化學會的人們所主張的，照他們的解釋；人是「仁道」，物是「霸道」。中國的文化是仁道，西洋的文化是霸道。可是實際上西洋的文化，並不盡是霸道；因爲它也有康德和基督教的王道：好像我們的文化，也不盡是人道

一樣。比方從中國的歷史看來，我們的春秋五霸，秦始皇的囊括天下，漢武帝的窮兵黷武；況且我們之得到今日的地位，乃由沿着黃河流域向外四方去發展；這倒是霸道的証明。這種見解，把東西文化分作人的和物的兩種，也是不通的。

(七)科學的方法 還有些人主張用科學的方法，去分析文化的特質，把我國固有的文化全盤托出，然後看那種特質是好，那種不好，而決定取捨的方針。但試問這樣便能把東西文化調和了嗎？比方我們應用這樣辦法去尋出大家庭制度，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特徵；其次再去估量它的好處和缺點：好處是互助的精神，而缺點是倚賴的惰性；最後便看世界的趨勢對於這種大家庭的價值是怎樣；其結果則証明大家庭制度不適宜於這種趨勢，而沒有辦法在這種趨勢下生存，主張此說的人們，可算是个好理想家，只惜在實際上也是行不通吧了。

(三)

(3) 關於澈底全盤西化的理由

現在世界的趨勢，既不容許我們復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許我們應用折衷調和的辦法；那麼，今後中國文化之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向澈底西化的途徑。上面我們已解釋了第一條路（復古派）和第二條路（折衷派）都不能跑得通；惟有第三條路（西洋派）纔是我們當行或必須行的途徑。第一條路和第二條路的缺點是：前者（復古派）昧於文化發屋變換的道理；而後者（折衷派）昧於文化一致及和諧的真義。前者誤以為環境時代是不變的；所以聖人立法，可以用諸萬世，而施諸四海；而後者則誤以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間舊屋子，我們可以拆毀牠，看看那塊石，或是料木，隨便可以留用。但是他們簡直忘却了文化各方面的特質，是不過我們的假定；在文化本身上，並沒有這麼的一回事。其實文化是全完的整個，沒能分解的。總之，無論積極方面，或稍極方面，都可以証明中國文之化出路，是要去澈底的西化。照主張澈底全盤西化的人們的見解，以為目下我們的政治，經濟，教育，社會，事實上，都已採用西洋的方法，這就是不只在思想上，並且在實行上，都已趨於完全採納西洋的文化。他們的主張，有下面的兩個理由：

(一)西洋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

(二)西洋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去接受，它畢竟是現在世界的趨勢。

伸言之：(一)從文化發展上看來，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確比我們的進步得多，它的思想，也的確比中國的思想為高。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科學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至於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頭，我們更不及西洋人的講究。就是梁任公先生在他的『清代學術史』裏，也要承認非用西洋的方法，便不能把國學來復活。真的，死的國學，也須要賴西洋方法的注射，纔得保其生存！

(二)從理論方面說來，西洋文化，是現代的一種趨勢。在西洋文化裡面，也可以找到中國的好處；反之，在中國的文化裡未必能找出西洋的好處。精神方面，孔子所說的仁義道德，未必高過柏拉圖的正義公道。十三世紀，中國的火藥印刷指南針數種，却為西洋人所接納而加改良；物質方面的好處，也可以在西洋文化裏找到。至若民治和科學，中國都沒有。即如座上諸君今晚得來這裡聽講，大多數人所穿的服裝，和目下諸君所受的教育，

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國家佈施的憲政，無一而非西洋的東西。又如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根本上就是西洋文化的產物。一切政治，社會，教育，經濟，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理論上和事實上，都無一而非漸趨於西洋化。從空間看去如此；從時間看來也是如此，西洋文化因它是由許多不同文化組合而成，所以中世紀的局勢，也比之中國好。千幾年，宗教和政治，希伯來文化，羅馬文化，和希臘文化，數種勢力平衡地來互相爭競，結果便產生了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和政治運動。可是中國漢朝，政教合一，政治的實力爲孔子的學說所鞏護，而弄到中國歷史上的單調和凝固。十字軍的東征，和元朝的西征，使東西文化得到接觸，使西洋文化有了變動，而中國自漢朝以後，却凝滯不前！

(三)從比較上看來，中國的道德，不及西洋；爲的是中國的道德家本身不好。中國人無論公德私德都不好。教育亦的確落後。法律的觀念薄弱。一國之本的憲法，素來也不很講究。哲學也不及西洋的思想，如柏拉圖哲學之有系統。物質方面，更不用說。關於這點想諸君亦表同情。西方文化既比我們的好，我們爲什麼不來澈底全盤的加以接受？西洋文

化，是不斷的創新與發展，而成爲現代化，和世界化。日本的本身已自西化。澳洲也成爲英國文化擴張的區域。對着現代世界文化，雖欲不加以接受，亦會被迫着去接受；因爲文化的趨勢是不能逆倒的。美洲的黑人和白人交處，自動的去接納西洋文化，便得以繼續繁衍。在一八六五年得了解放，以後更日進無已；可是該地土人，不肯接受，便日漸歸於淘汰。現在反要受美國政府保護來生存。卽如廣東的苗黎，跑入五指山，不肯和漢人來往，也使一樣的漸趨淪亡；這是世界文化的趨勢。西洋的文化，較之我們的文化高。爲什麼見了他人高於我們的文化，而不去接納？諸君，請不要以爲兄弟說得太過。我們若以爲帝國主義是西洋文化的產物，我們若想打倒可惡的帝國主義，決不能以王道來打倒它，却反過來要用帝國主義去打倒帝國主義。因爲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實際上，非此便無法爲中國的文化找到一條出路。

可是有些人說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亡，民族也必隨之而亡。此說是不真確的！文化是由人類所創造；過去的文化，只是前人努力得來的結果。現代和將來的文化，還要今

目的我們善繼善承的不歇地去發展與創造。（文化是人類適應時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結果和工具。）文化的本身，是整個人類所共有共享的東西，而不是任何一國家，任何一民族的專有或專利品；所以文化亡，並不見得民族也隨之而亡。試看東鄰的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盡量的採納西化，結果便一躍而躋於富強之域，他們不但種族因之而興盛，他們的祖宗所遺下的文化也因之而光榮。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反証。但有些人以爲西洋人也嘗研究中國的文化，爲什麼我們要忽視我們的文化？可是我們該要知道西洋人之來研究我們的歷史，只不過是爲了研究而研究，並不是爲要來倣效我們的；正好像他們跑去非洲研究該處的文化，而沒有去想着研究採納該處的文化一樣。更有些人以爲我們若不去發展中國的文化，便恐怕將來在歷史上沒有了位置。我則以爲這是未免過於憂慮。因爲中國文化，老早已成爲世界文化的一部份。現下若有人來寫世界史，而不把中國史也放在裏面，那人的知識便是不大廣博的。即使數千年後，中國的歷史仍必有它相當的位置。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那麼，我們委實不憂中國的文化將來會被人們忘掉了的。

(四)

(4) 關於「西化」的責任與希望

誰起來擔負這個澈底全盤西化的責任？回答是在南方的青年學生身上。不單在政治上，南方是個新文化的策源地。西洋文化的輸入，從地理上看，多是在南方。在漢朝，廣州已爲中外交通的孔道，而爲對外貿易最着要的市廛。到了唐代，也爲貿易的中心，直至明清，也是爲交通的要道。其他如政治，教育，宗教的文化演進，亦多以廣州爲起點。即如西方宗教的輸入，最初到中國來宣教的利瑪竇，也在廣東住了十多年；又新教的傳教士馬禮遜，也是先到廣州來；而第一位中國宣道師梁發，也是這裏的人。其次說到新教育，是以容闳，黃勝，黃寬，三位爲最先的留學生。至一八七二年第一批赴美留學生中，廣東人佔了九十多位。再如新文學的創始，也在這裏受西洋文化不少的影響。文字革命（通俗文替代文言）很早便由梁任公和嚴復兩位先生在書信裏有所討論。就算五四運動，若無戊戌

以來，如梁啟超的努力，爲之倡導，面把古文變成通俗化了，或者不會得有今日之成功，成爲簡單化。同樣，黃公度在詩的解放上，也有很大的功勞。經濟方面，福建和廣東的僑民，也影响南方的經濟很大。政治方面，如孫中山先生，也是這裏的香山縣人。再而說到城市運動，廣州不但是開中國新城市的紀元，并且是現在由中國人管理最西化的一個城市；這是凡研究中國城市和市政的人們所公認的。又如勞工運動，也是始於南方，好像多年前的海員大罷工，和現下機器工會等組織。至若中國十幾年來的女權運動，也是盛於廣州。女子教育在廣東也十二分發達。大學男女同學，也以廣州南大爲先。民九，十年，廣東女子已實行參政運動，而在廣東臨時議院已有女子議員；因此南方人的責任很大。思想最新的，也可說是南方人，像容閔嚴復等。又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開發中國人知識使明瞭世界的大勢。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根本上也是西化的思想。他的理想中國人是美國的華盛頓。西洋文化，是他的革命環境。他反對中國的舊文化，推翻專制的政體，而建立共和的民國。總之南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思想是最先進。最後歸結說到中國文化之出路，無疑

地是要從澈底全盤西化着手。希望諸君起來負起這個責任。本校爲政治革命的結晶品；把西洋文化澈底努力的去採納與發展，是在今晚各位的身上了。

按：此講詞的草就，大致是把陳序經博士該晚的演講筆記下來。此外，更還得到陳博士平日所發表的文字拿來參考，而且得到他的同意加入多少意見，并蒙賜予修改及指正；理當在此併加聲明——記者附識。

元旦脫稿於南大，爪哇堂。

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

陳序經

（此文見現代青年欄八三六期）

陳序經先生的演講辭：『中國文化之出路』發表後。張磬先生便寫了一篇：『中國文化之死路』（見現代青年欄八三四期）反駁陳先生。這篇文章，是陳先生答張磬那篇：『中國文化之死路』的。

編者附誌

自從梁錫輝君把我在中山大學所演講的中國文化之出路的筆記在現代青年發表以後，就有謝扶雅先生和張磬先生關於這個文題的論文在這裡發表。謝先生對我的意見，好像不大清楚，而且他並沒有明白的解釋他和我的不同處，所以我不願在這裡討論。至於張先生的文章，除了用村婦罵街的口氣來胡說外，我並不見得他那篇文的長處在那裡。這種村婦罵街式的爭辯，本來值不得反駁。就使有了反駁的必要，可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也是恐怕徒勞而無益。但是張先生好像是以指導青年的領袖自命，同時他所責備於我者既深且刻，我只好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答覆。

張先生對於文化的解釋是完全站在最流行的經濟史觀上，他抄陳高傭先生在中報月刊二卷七號所發表的『怎樣使中國文化現代化』一文裡一段來證明他的主張，然而他好像忘記了陳先生這段話是作八十五年前馬克斯在其哲學的窮困裏 *Misere de la Paillasse. Respons* *e a la Phiozoble oe Misere de M. Proudhon* 脫胎而來。馬克斯在那個時候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改變，是隨着生產方法的改變。他又說：手磨的時代，造出封建諸候的社會；

蒸汽磨機的時代，造出工業資本的社會（參看哲後的貧困頁一五三）。馬克斯的學說，說起來雖非這麼簡單，然而他的經濟史觀的精華，已在上面數話裏表現出來。張先生所摘錄陳高備先生那段話，也不過是上面所舉出幾句話的註腳。以經濟的立場來論明文化，在馬克斯以前雖有片斷的說明，然而有系統的研究，要推馬克斯為最先。自馬克斯以後，一般擁護這種學說的人，雖支流紛紛，然大概也不會跳出馬克斯所畫的圈子。我以為除非張先生和他所崇拜的陳先生不承認他們所主張的文化經濟基礎觀，是間接或直接的受過馬克斯的影響，除非他們誇張以為這個學說是他們自創的，那麼他們所提倡的中國文化的「生路」，也不外是拾了西洋人的餘唾。他們又何嘗有甚麼澈底的研究乃大事其宣傳呢？

其實我們對於馬克斯這種經濟史觀，是不容易隨便贊同的。因為她並非絕對的無可議論的。而且事實上馬克斯在他的資本論第三卷（參看 *Das Kapital* 頁111-115）明明白白的說，經濟的原因乃社會或者是文化的發生和發展的很多原因之一。關於這一點，認識馬克斯最深切的恩格斯於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四年間，也發表了好多書信，說明馬克斯和他並沒有否

認經濟原因以外的許多原因。

我的見解是：單以經濟原因來說明文化，是很容易陷於錯誤的，何況經濟的本身，不外是文化很多方面的一方面。經濟的勢力，固可以影響於文化的其他方面；文化的其他方面勢力，也常常影響於經濟的制度和觀念。中國今日的經濟危機，固然會影響於文化的其他方面，然而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制度，政治，道德，教育，種種之影響於中國的經濟，難道張先生總不承認嗎？

我以為假使張先生不是受過西洋思想和制度的影響，他恐怕夢也不能夠有所謂經濟史觀這回事，他恐怕還是念着「君子不器」，去食去兵而存信的信條。

張先生誤解我最大的地方，是他把「西化」來和「西貨」混爲一談。我雖是極力主張全盤和澈底的「西化」，却不主張盲目的全盤和澈底接受「西貨」。六年前我在「再開張的孔家店」一文裡已經這樣的說：

晚近以來，我們每聽一般人說：西方的物質文明是優過東方的。他們對於物質

文化是願意採納，但是他們極力提倡東方的精神文化。我們承認「文化」二字是包含精神和物質二方面，然若一方面提倡西洋的物質文化，他方面又提倡東方的精神文化，是行不去的。良以把文化來分做物質精神二方面，乃我們爲了利便研究起見而發生的主觀的觀念，並非文化本身上有物質精神之分。因爲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不能分開的。所以物質文化的演化，是隨着精神文化的演化。我們差不多可以說物質的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現。讀過歷史的人，當能知道這話不錯。西方近代的物質文化，是隨着文藝復興以後的精神文化而生的。史家稱中世紀爲黑暗時代，精神文化既沈於墜落的境地，物質文化也沒有發達。數千年來的中國，受困於專制思想的淫威之下，得過且過。所謂精神的文化既走不出二千年前的精神文化的圈子，結果二千年後的物質文化並沒有什麼精彩過二千年前的物質文化。最近數十年來，物質文化上能夠有半點的進步，無非是數十年來精神文化上有多少變化之結果。物質文化既不能離精神文化而獨立，採取人家的物質文化，應當要採取人家的精神文化。

我又說：

專去採取西洋物質文化，不但是件行不得的事情，而且是一件最危險的事。我們若只歡喜住洋樓而不求做洋樓的材料和方法，只喜歡坐汽車而不求做汽車的材料和方法，結果只有消耗而沒有入息。這樣做去則帝國主義者雖不侵畧我們，我們的生計上必日趨日蹙，而終至於自殺的地位，數十年來我們所謂利權外溢，國境日窮，一方面固由外國之侵畧政策所使然，一方面亦未嘗不因我們只知提倡物質文化，只會享受物質文化，而不知求物質文化所以成爲物質文化所由來。然欲知物質文化所由來，於精神文化不得不格外注重。

我想這兩段話至少可以說明我並非一個主張徒事享受西洋貨的人。我主張全盤西化，就是爲着反抗那般專事享受西洋貨的人的言論。張先生不滿意於『全盤』二字，張先生爲什麼不看見我所說的『徹底』二字。要是張先生會說中國文化也有其優越之點，應該保存，我們就要問問她的優點是什麼呢？

事實上，張先生告訴我們道：「我本來決不是絕對反對西洋文化的人，更不是所謂那些復古派折衷派」。我要問問張先生，你既不是復古派，又不是折衷派，同時對於我們所主張的全盤澈底西化，也不贊成，你究竟是甚麼呢？

張先生又說：

不過像他們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而不言手段，只標目的籠統的宣傳，必至一般青年們盲目的崇拜西化，以至穿西裝是西化，吃西菜是西化，住洋樓是西化……。張先生要明白一般青年們之穿西裝，吃西菜，住洋樓，並非是受過我主張全盤西化的影響而來。我主張全盤西化雖則不會反對人穿西裝，吃西菜，住洋樓，然而若說全盤西化不外是穿西裝吃西菜住洋樓……，那麼張先生所解釋的全盤西化，是張先生自己的全盤西化，並非我所主張的全盤西化了。

張先生又說：

博士又誇耀廣州市的西化。不錯，廣州洋樓多，汽車很多，影戲院也很多……，

但是博士知道嗎？這些，這些就是農村裡的金錢往都市流，都市裡的金錢往外洋流的象徵……。

我說廣州市是中國最西化的城市，不過就事實及歷史方面來說，並不是像張先生所說是爲着誇耀而說。張先生呵！要是你對於這個「觸目驚心」的城市，反對到這麼利害，對於救濟農村破產的熱忱這麼懇切，爲什麼你自己却偏偏也要在這個城市裏住洋樓，坐汽車，也許會食西菜……呢？爲什麼你不跑到農村裡救濟農民，從事生產事業，而偏偏跑來城市裡，享受城市的便宜，利益，而要別人跑返農村呢？難道中國人所說的「己立立人」的古訓，你也忘記了嗎？像張先生這樣的言行不一致和矛盾，豈非正是像他自己所說「是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是努力於自殺運動的工作」嗎？

最後，張先生又提起前年的關於大學教育的討論。他說明他反對西化主義的教育，他又反對爲學問而求學問的主張。

若是我的記憶和認識不錯，張先生是在過新聞學院當教席，還曾在現代青年發表過

篇「娛樂教育」論。關於把大學教育爲娛樂教育的偏見，我在廿一年七月廿八日現代青年欄裡發表「敬答對於拙作對於現代大學教育方針的商榷之言論」一文，已經解釋。我現在要問，張先生自己所教授的新聞學，是不是西化的教育呢？倘若不是，難道又是張先生的自創的嗎？若是是，那麼張先生又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至於張先生批評我爲學問而求學問的主張，我在前年夏所發表幾篇文章已經說明。要是張先生對我的主張，還要加以指摘，我請張先生告訴我，你所求的學問，既不是爲學問而求學問，那麼那種學問，除了舞文弄墨，徒事宣傳以外，又給過社會民衆多少利益呢？

末了，我希望張先生第一要自己要言行一致，勿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凡討論這樣的問題，要先有相當最低限度的研究，勿事糊塗瞎說。要是張先生覺得的主張是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則最好由張先生自己以身作則，自己無矛盾地實現起來，非然者，我們尙何須多言？

『附錄』

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

張磬

（此文見現代青年欄八四〇期）

——毒瓦斯煙幕彈機關槍的總檢討——

我的那篇「中國文化之死路」的文章，對於那般籠統的盲目的西化運動者，自不無抨擊之處。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自然有義正詞嚴聲疾呼地痛加駁斥的必要！——尤其我們負領導青年職責的教育者，當仁不讓，但決不同陳博士爭一席「領袖自命，」的地位。現在陳博士的答文，亦既在現代青年上發表了，青年們也讀到了，才知道所謂全盤西化運動中，還有所謂，「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之類；并且，甚麼「專去採取西洋物質文化，不但是一件行不得的事情，而且是一件最危險的事

……」等等的話頭。我那篇文章的任務，總算已獲得相當的効力；至少青年們對於西化運動有進一步的認識——雖然還不澈底。

至於他沾沾自喜反攻的話，原在我意料之中。不過，出乎意外的，陳博士駁論的態度上，未免失去了尊嚴，甚至罵人家的文章是「村婦罵街式」的；但這樣，也決不會得把自己的「博士罵街式」的文章地位抬高，顯出甚麼「長處」來呢！

我對於中國文化運動的態度，已在前後各中文說了許多話，本來非常明白；而陳博士既也承認盲目的西化運動的危險。似乎不值得再浪費筆墨來理會這些所謂「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徒勞無益」的爭辯。可是陳博士的戰術可不錯，還要費現代青年一些篇幅來說一說：

他開頭就用最新的戰術，在飛機上投擲下一個毒瓦斯炸彈。但是，這個

毒瓦斯——毀滅不了的事實。

的確，在中國社會裡，一抬出，「馬克斯」三個字，人家不免要驚駭却步，但

是，我不是馬克斯學說盲從者呢！我只擁護事實。事實上既有了証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就做了我的中國文化運動的理論基礎。

中國的西洋文化運動，原不是自陳博士始。五四的時代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敲醒了全國思想界的夢。誰不異口同聲地力主全盤西化。果然，浩浩蕩蕩，頗極一時之盛，所謂塞恩斯與德謨克拉西——這大概是被指爲所謂精神文化的東西——的高潮，瀰漫了全國，懿歟盛哉！請問得到些甚麼呢？除前文所說負數的記錄外，至多不過給予了西化運動輪迴教育者的口頭上，書本上互相傳授的衣鉢。所謂「舞文弄墨，從事宣傳，給過社會民衆多少利益！」並且，也許可以說，科學與民主主義在中國，却給了封建殘餘勢力做了工具，去幹剝削民衆的工作，與利用民衆的勾當；在中國，如其科學沒有封建勢力做背景呢，簡直無存在之餘地。大家總還記得吧？

我早已說過，要懂得「紡車上產生不出電力」的原理，才可以談中國的文化問

題。但是，這些蠢笨的文化園丁，還想全盤把西洋文化移植於中國封建經濟的園地裏，他們既陷入了不可通的死路，却還在口口聲聲地夢想着出路，徒見其逡巡徘徊，心勞日拙而已！

人類的生活，既建築在經濟基礎上頭，無論誰，都跳不出經濟的圈子，而受所支配。而文化就是人類的生活表現；所以，文化當然要受經濟勢力所決定——雖然經濟本身也是文化的一方面。這原是極明白的事實，果何必要舶來品的經濟史觀做護符呢！最可憐者：他們坐在船裏，明明自己跟着船的走動而變更其視野，但偏偏口口聲聲地說，岸上的草木屋舍在向後跑呢！還有甚麼話說！

文化對於經濟，也有其相當的影響，我並不否認：不過，影響，止於影響而已！我那篇「從社會的觀點探討中國的文化」中，也有過這麼一句，「不過，凝定了的舊文化，對社會有其惰性的反作用；而沒基礎的新文化，對社會只有相當的影響而已。」這裡所謂社會，當然包括經濟制度在裡頭的。

博士說：「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制度，政治，道德，教育種種之影響於中國的經濟，難道張先生總不承認嗎？」不錯，但是，要知道：這些，這些，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生活所搏塑出來的呢！只要把封建經濟推翻，就換上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那末，上面的思想，習慣，制度，政治，道德，教育等一切一切，就要大大的翻案。那只要稍治西洋近代文化史的人，總也不至於否認吧！

博士說：「我以爲假使張先生不是受過西洋思想和制度的影響，他恐怕夢也不能夠有所謂經濟史觀這件事。」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概。且慢得意！可是，我的態度很坦白：「我決不是絕對反對西洋文化的人……」陳博士「爲什麼不看見我所說的『決不是絕對反對』，這幾個字呢？我還主張，當前的西洋文化，該給予嚴解剖批判工夫。我反對的，原是那無條件的全盤接受，陳博士「爲什麼不看見」呢？

總之，我要樹起堂堂正正的旗幟來反對的，就是「他們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而不言手段，只標目的地，籠統的宣傳……」因爲籠統的宣傳，勢所必至的流

弊，是「盲目的崇拜西化……」一誤焉容再誤！這是我前文發表的微意。

費了許多篇幅，現在應該說他第二步戰術了。接着，他又拋了

一個烟幕彈——以掩護自己的立場。

這裡，除「西化」之外，又跳出了一個「西貨」甚麼。「我雖是極力主張全盤和徹底西化——這裏不說接受了，確有意思。作者註——却不主張盲目的全盤和徹底接受「西貨」，以移嫁籠統的盲目西化運動的責任。倒連的「西貨」，代人受過！下面又提出了「物的文化」與「精神文化」，「採取人家的物質文化，應當採取人家的精神文化」等語。

關於前者西貨的辯正，可見已承認我所指摘的籠統的西化運動的危險。

關於後者，說起來話長呢！

據我看來，這種話，原是極陳腐的見解，似乎抄襲了胡適博士的老調；但却取了他的短處，遺了他的長處。胡氏在十五年，曾有「我們對於西近代文明的態度」一

文——北新有單行本。他因為當時一般人譏貶西洋文明爲唯物的，而尊崇東方文明是精神的。所以他反過來說以警告國人：証明西方的才是科學的精神文明，而東方的却是懶惰的唯物文明。但是他解釋文明，却明明白白地說：

「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

并且他一方面却承認：

精神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基礎之上。提高人類物質的享受，增加人類物質上的便利與安逸。這都是朝着解放人類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們不至把精力心思全拋在僅了生在上，使他們可以有餘力去滿足他們的精神上的要求……」

他雖徘徊於心物二元論的道上，還沒找到出路，畢竟還搔到些癢處。陳博士却抄襲了胡博士的西洋精神文明的見解，竟推演成所謂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謬說。

陳博士既然是所謂「澈底西化」而注重所謂「當採取人家的精神文化」的人，應該「自己以身作則」。「拿証據來」，是西洋文化中的科學精神。陳博士既然說：

「物質文化的演化是隨着精神文化，的演化。我們差不多可以說物質的文化，是精神的文化的表現。」

自然應該根據歷史上的事實來清清楚楚地証明。現在這樣含混過去，甚麼「差不多」，甚麼「讀過歷史的人，當能知道這話不錯。」科學精神在那裡？不是該「自己打自己嘴巴」嗎？

博士說：「西方近代的物質文化，是隨着文藝復興以後的精神文化而生的。史家稱中世紀爲黑暗時代，精神文化既沉墜落的境地，物質文化也沒有發達。」這大概算証據的，誰相信？并且，何以黑暗時代精神文化沉於墜落的境地？何以文藝復興以後精神文化會產生！這樣歷史上的重大的因果關係，陳博士竟把他含糊地疏忽過去了，「澈底」云何哉！你既陷入這因果倒置的重大錯誤中，當仁不讓，我應該要

用科學的精神，根據史實，加以糾正。

當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帝國的領土內的時候，把過去古代文明基礎的商業貨幣經濟的社會，完全破壞了。他們既植根基於定住的農業經濟之上，不久，就有許多侵略者來襲擊他們：東來者有芬族，南來者有薩拉森人，北來者有諸曼人。他們爲了對付這些敵人防守自己田地，於是發生了分工：一部分人專任戰事；一部分人專事農作。把一定的收穫提供給酋長，不久之間，就發生了領主與武士階級；于更進而發生領主與領主的土地爭奪戰。結果，自然土地集中。強有力的領主，佔得廣大的領土，再命有功的武將去分治領土，而治爲國王。諸侯亦各自領有封土，養了武士，準備爲國王效忠。在土地和農奴的經濟基礎上。

形成了封建主義的社會制度。

自然，日耳曼人既開始了進入定住的農業文化階段，適應於農業經濟封建社會的宗教勢力，如所謂神秘的宿命觀與超登天國等，自然會侵透于農村組織之中。至



君士坦丁帝而與宗教政治勢力結合，形成封建時代的權威，造成歷史上的黑暗時代。

封建權威之下，自然沒有科學，沒有民治。所以，一切教育，都染上了宗教的色彩：以道德的修練為主，讚美神祕的迷信的詩歌及証明聖經的奇蹟和開天闢地之說的御用學者的經院哲學等，竭力排拆希臘思想，有建議反禁條的，以宗教裁判嚴厲處罰；只許人信仰與祈禱，不許人懷疑。學者如奧古斯丁，甚至宣言，建設天國者是無學者。所以，迷信與無知的暗雲，在羅馬教會支配之下，層層籠罩。這就是所謂黑暗時代。請與我們的目前的大時代對照一下。這是中古黑暗時代所謂精神文化沈於墜落的境地的經濟背景。

自十字軍東征失敗後，因為與東方交通航海貿易頻繁的結果，貨幣經濟侵入了田園和城廓，而代替了從前土地與農奴的出產，於是封建經濟開始崩潰，工商業漸次發展。

工商業既到處繁榮，從事工商者因為獨得了巨大的經濟勢力，漸漸形成了社會上的有力階級。他們爲着反抗領主的壓迫和誅求，擁護自己的營業權益，并防止同業間的競爭，與研求共濟互助之法，便互相團結起來，而有類似今日同業公會的行會組織。行會的聯合，便發達了工商業者所聚居的自由都市。

隨着貿易的擴張，都市經濟勢力，日趨雄厚，就衝破了封建的壁壘而出頭反抗。他們的自由和特權，便隨着他們的荷包膨脹的正比例擴大開來。貨幣經濟既替代了土地經濟支配了人們的生活，那末，依存於土地經濟的封建勢力，自然完畢了它的歷史的任務，而一天天崩潰倒塌了。

我早已說過，人類的生活，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上的。所以，經濟基礎既大大的變動，人類的精神也發生了大大的轉變。——使人們覺醒自己的權力，發生自信，示之以世界美滿和生活的愉悅，且使其覺察生活上之過去的連續，以及要來臨的將來的偉大。——偉大的文藝復興時代，就在這自由都市貨幣經濟的園地裡開出燦爛

之花來。當時，意大利因地理上的優越，自由都市特別發達，自然做了商業資本的中心。文藝復興，何以意大利佔了『十月先開嶺上梅』的先鋒呢？總不要來我說了把

——這是文藝復興時代精神文化的經濟背景。

事實勝於雄辯，我的立論，就建築在這些事實上面，恰恰與博士的主張相反。就是：

「精神文化的演化，隨着物質文化的演化。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不說『差不多』那樣不科學的話。——精神文化是物質文化的表現。」

所以，要和道精神文化，原是中國文化園丁的一種單相思。西洋的精神文化，原不肯隨便跟人走的呢！中國二千年來，正因為陷在封建經濟裡，一方面專制思想——依存於封建勢力的——的淫威便根深蒂固；一方面就所謂精神文化停滯不進。所以，目前中國文化運動最迫切的工作，要把封建經濟基礎整個改造，所謂現代化，然後有現代的文化。否則，中國文化永無出路可尋，只有在死路上徘徊而已！

陳博士既然知道「專去採取西洋物質文化，不但是一件行不得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們若只歡喜住洋樓而不求做洋樓的材料和方法，只歡喜坐汽車而不求做汽車的材料和方法，結果只有消耗而沒有入息……」請問博士站在青年面前演講的時候，幾曾一想起此？也幾曾「己立立人」？陳博士的入息在那裡？「這樣言行不一致和矛盾，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嗎？」

還有，博士明明白白地推諉「一般青年們之穿西裝，吃西菜在洋樓，並非是受過我主張全盤西化的影響而來」。但是，「你雖不殺伯仁，伯仁由你而死。」你那樣籠統地主張全盤西化，青年們的盲目的崇拜西化，是勢所必然的。至少，現在穿西裝的青年們會說是博士的信徒呢！所以，這種關係是脫不了的。所以，我們站在青年面前演講，必須要三思而行啊？

還有，最奇怪的，最後大放其

機關槍——浪費了許多無謂的子彈。

實在呢，弄巧成拙，反『自己打了自己嘴巴。』本來，攻擊到私人的生活，是駁文的下乘，值不得來說。

我說了『都市的西化，是建築在農村經濟破產上的。』博士便說：『你對於這個觸目驚心的城市反對到這麼利害……爲甚麼你不跑到農村裡……而偏偏跑來都市……』這樣無聊的反駁，不是『村婦罵街式』的口吻是甚麼呢？我所以那樣說，原是要指出不從經濟基礎上推進的西化運動裡包含的大危險，不值得誇張的。博士原也承認了這個，所以下面要硬把『是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是努力自殺運動的工作』同城市的問題牽在一塊，不免滑稽！這個呢，原是一般不言手段只標目的地籠統的西化運動者所應得的酬報，於我何有哉！

最後，又涉及前年的問題。不錯，我那時在新聞學院當過教席的。署名柔石的娛樂教言論是拙作。只是大作發表隔時過久，而那時我又因事忽忽離粵，所以懶得駁覆了。至問我教授的新聞學是不是西化教育，真的笑痛了我的肚子。我的回答是

：我並未教過新聞學，我也並未到外洋得過博士碩士的頭銜。所以，下面說的「自己打自己的嘴吧」，理該還敬博士。

博士又問：「你所求的學問，既不是爲學問而求學問，那麼那種學問，除了舞文弄墨徒事宣傳外，又給過社會民衆多少利益呢？」我的回答是：我却不想做專家博士之類，來「舞文弄墨，徒事宣傳」，但我還有一個坦白的心。我原想背着十字架來向民衆贖罪。話扯得遠了，就此住筆。

末了，我希望博士的澈底西化運動，「第一要自己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勿自己打自己嘴巴。」第二，要對於過去西化運動的事實背景得失，「要先有相當最低限度的研究，勿事糊塗瞎說。」以至未見成效，先見敗徵。「非然者，我們尙何須多言？」

註：「內語 借陳序經博士原文。」

二三，一，三〇、晨於東山。

讀「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後

呂學海

——「代陳序經先生」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張磬先生」——

「最近讀了張磬先生在現代青年欄發表的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的文章，頗有感觸，我覺得張先生的大作，確是盡了所謂咬文嚼字和所謂套人語句之能事——註：這種能事，不只一次。張先生的態度，不獨失檢，其理論尤爲矛盾謬誤之極。作者不敏，謹一試用張先生之作文方法，撰成此篇，作爲『破』璧奉還。願讀者于此篇跡近文章遊戲的字裏行間，讀出真理來。」

「作者附識」

註：此文中「內語是我的，沒有」「是借用張先生的。」

——毒瓦斯煙幕彈機關槍的「再」檢討——

我的那篇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文章，對於那般籠統的盲目的「經濟史觀而左傾」者自無不抨擊之處。這是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自然有義正詞嚴大聲疾呼地痛加駁斥的必要——尤其我們「青年學者們」。「張先生」的答文，亦既在現代青年上發表了，青年們也讀到

了；才知道所謂「經濟勢力之外」，還有「其他的勢力」；并且，「所謂經濟本身也是文化的一方面」等等的話頭。我那篇文章的任務，總算已獲得相當的效力；至少青年們對於西化運動有進一步的認識——雖然還不澈底。

至于他沾沾自喜的反攻的話，原在我意料之中；「而且不」出乎意外的，「張先生」駁論的態度，「并未」失去了「胡說」，「以」至罵人家的文章是博士罵街式的；但這樣，也決不會得把自己的「村婦罵街式」的文章地位抬高，顯出甚麼長處來呢！

我對於中國文化運動的態度，已在前後各文中說了許多話，本來非常明白；而「張先生」既也承認盲目的「左傾」運動的危險；似乎不值得再浪費筆墨來理會這些所謂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徒勞無益的爭辯。可是「張先生」的戰術可不錯，還要費現代青年一些篇幅來說一說：

他「裡」頭就用「他以爲」最新的戰術，在飛機上投擲下一個毒瓦斯炸彈。但是，這個毒瓦斯——毀滅不了的事實。

的確，在中國社會裏，一抬出「胡適之」三個字，人家「好像」不免要驚駭却步。但是，我不是「胡適之」學說「主張」者，「何況我有和他不同之處」呢！我只擁護事實，事實既有了證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就做了我的中國文化運動的理論基礎。

中國的「左傾」運動，原不自「張先生」始，「民十五六年共產主義」文化運動，敲醒了全國思想界的夢。「好多」異口同聲地力主「共產」文化。果然，浩浩蕩蕩，頗極一時之盛，所謂「打倒資本」——這大概是破指為「經濟文化的東西」——的高潮，瀰漫了全國，懿歟盛哉！請問得到些甚麼呢？除「像張先生」所說負數的記錄外，至多不過給予「左傾」運動輪迴教育者的口頭上，書本上互相傳授的衣鉢。所謂舞文弄墨，從事宣傳，給過社會民衆多少利益！並且，也許可以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却給「某某」殘餘勢力做了工具，去幹剝削民衆的工作，與利用民衆的勾當，在中國，如其「左傾」沒有「某某」勢力做背景，簡直無存在之餘地。大家總「要」記得吧！

我已說過，要懂得「全盤西化是打倒復古派與折衷派」的原理，才可以談中國文化問題

。但是，這些蠢笨的文化園丁，「專」想「某某」的殘餘「來」移植于中國「虧本」經濟的園地裏，他們既陷入了不可通的死路，却還口口聲聲地夢想着出路，徒見其逡巡徘徊，心勞日拙而已！

人類的生活，既建築在「文化……」基礎上頭，無論誰，都跳不出「文化……」的圈子，而受所支配。而「經濟」就是人類的生活表現；所以，「經濟」當然要受「文化，……」勢力所決定——「因為」經濟本身。也是文化的一方面。這原是極明白的事實。「我們既承認西洋人的文化不是上帝特與的，又不承認中國人的心理生物地理各種基礎不能適合西化，何不要全盤西化呢？」最可憐者，他們坐在船裡，明明自己「靠」着船的「穩固」而「維持」其「平安」，但偏偏口口聲聲地說，「船是無用的」呢！還有甚麼話說！

「經濟」對於「文化」，也有相當的影響，我並不否認，不過，影響止于影響而已！「你那篇」從社會的觀點探討中國的文化「裡，所謂社會」雖然包括經濟制度在裡頭的，「但是社會未必就是經濟，所以從社會的觀察探討中國的文化，應當改作從經濟的觀察探討中國

的文化。」

「張先生」說「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制度，政治，道德，是受經濟的影響」，不錯，但是，要知道，這些，這些，原「不只」是中國的封建經濟生活所搏塑出來的呢！「專」只要把封建經濟推翻，「未必」就換上了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那末，上面的思想，習慣，制度，政治，道德，教育等一切一切，就「未必」要大大的翻案。那只要稍治「中國」近代文化史的人，總也不至于否認吧？

我說：「我以爲假使張先生不是受過西洋思想和制度影響，他恐怕夢也不能夠有所謂經濟史觀這件事」，「確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概。「并非」得意！「因爲你」的態度「不坦白呢。」你「說，『你』決不是絕對反對西洋文化的人……」我爲什麼不看見你所說決不是絕對反對這幾個字呢。」（註：我且反駁過）「你雖」主張當前的西洋文化，該給予嚴密的解剖批判工夫，「可是你除了把馬克斯式的二手材料，硬吞下去，並不有相當的研究。」我反對的，原是那無條件的「經濟原因」。「張先生」爲什麼不看見呢？

總之，我要樹起堂堂正正的旗幟來反對的，就是他們「頑固復返所謂中國固有文化，糊塗過了東西合璧的矛盾生活，盲目拾了馬克斯的餘唾，」而不言手段只標目的地籠統的宣傳——因為籠的宣傳，勢必至的流弊，是「頑固的復古，糊塗的折衷，盲目的假馬克斯化」。一誤焉容再誤，這是我前文發表的微意。

費了許多篇幅，現在應該說他第二步戰術了，接着他又拋了一個

烟幕彈——以掩護自己的立場。

這裡，除了經濟基礎之外，「張先生」又在「現代青年上發」出了一個「中國教育復興運動宣言」什麼；「其實中國的宣言太多了，用不着張先生來助興，何況，要是經濟是一切文化的唯一基礎，寄生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教育，也用不着來提倡；又何況，只是宣而言之，却沒有行呢！」倒運的「經濟史觀，」代人受過！「上年張先生的娛樂教育一文又提出中國貧在物質，西洋病在過重物質，所以西洋固可以研究哲學，增辦大學，中國就要……」等語。

關於前者「經濟基礎」的辯正，可見已承認我所指摘的「唯一經濟原因」的謬說

關於後者，說起來話長呢！

據我看來，這種話原是極陳腐的見解，似乎抄襲了「薛福成公使和貴本家張之洞老爺的」老調，但却取他的短處遺了他的長處。「薛氏在光緒二年，曾有代李鴻章答彭孝廉書——南大圖書館有他文集，張氏在光緒二十四年曾有勸學篇一冊——從前廣東廣雅書局有王存善寫檢本。張先生對於張老爺的見解，因為是家傳寶物，必能洞識，毋庸贅述。薛公使呢，他因當時一般人譏貶西洋文明爲「鬼」物，——或「壞」物的，而尊崇東方文明是精神——注「精，美也；神，是明也。」的，所以他「半」反過來說以警告國人，証明西方的「也」是器物的精神——註「同上」，文化而東方的却是懶惰的「劣」物文明，但他解釋「文明」却明明白白的說：

中國所尚者，道爲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爲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使炎帝軒轅，復生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自然之勢也

。今之議者，動引古怪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之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經制度，勿有名無實，而于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爲一家。」

他雖徘徊于心物二元論之道上，還沒找到出路，畢竟還搔到些癢處。「張先生」却抄襲了「薛公使」——不，那時還未做公使的，「西洋的」器物的「文明的見解，竟推演成所謂「貧在物質，重在物質，」的「腐」說，「張先生」既然是所謂「經濟基礎，」而注重所謂「物質文化」的人，應該自己以身作則——註「原文太深奧，看不出有什麼關係，」拿証據來，是西洋文化中的科學精神，「張先生」既然說：

精神文化的演化，隨着物質文化的演化，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精神文化是物質文化的表現。

自然應該根據歷史上的事實來清清楚楚地証明，現在這樣含混過去，甚麼「科學的，」什麼「只要治西洋近代文化史的人，總也不至于否認」？科學精神在那裏？不是該自己打自

的已嘴巴嗎？

「先生」說，西方近代的「精神文化完全是經濟制度的產物，由此類推以至中世紀古代，也是這樣」，這大概算証據的，誰相信？并且，何以黑暗時代，「物質」——註「經濟也在內」文化沉於墜落的境地？何以文藝復興以後，「物質」文化會產生？這樣「文化」上的重大的「互相」關係「張先生」竟把它含糊地疏忽過去了，「明白」云「乎」哉？你既「昧於互相影響」的重大錯誤中，我應該要要用「嚴正」的精神，根據史實，畧加糾正：

當日耳曼人侵入羅馬帝國的領土的詩候，——「我註日耳曼人之侵入羅馬，和羅馬之所以興盛和衰亡，是完全由經濟變遷而來，誰信？下面用不着去駁。」

自然，日耳曼人既開始了進入定住的農業文化階段——「我註這麼一進，也是完全由于經濟作祟，誰信？」適應于農業經濟封建社會的宗教勢力如所謂神秘的宿命觀與超登天國等，自至會侵透于農村組織「經濟」之中——我註「可是宗教怎樣起源呢，日耳曼？羅馬？的經濟基礎生出希伯來的基督教來嗎？」可笑——至君士坦丁帝而與

宗教政治勢力結合……我註「君士坦丁帝之把基督教爲國教，是完全由于經濟的原因嗎？西洋那一本歷史是你讀過的呢？」

自十字軍東征後……我註「十字軍東征，也是爲着經濟的原因嗎？前提經已錯誤，我又何勞駁及結論。」

……意大利因地理上的優越——我註「呵呵！地理的原因，「張先生」也承認了，唯一以經濟的原因，來說明文化的「張先生」，又豈不是跳不出我的圈子？還有在爲中國文化問題再進一解一文裡，「張先生」又大倡其民族意識，從經濟上着手就夠了，又何須民族意識呢？」

事實勝于雄辯，「你」的立論，就建築在這些「雄辯」上面，恰恰與「我」的主張「有了」相反。就是：

「文化的物質與精神之分，不過爲我們利便認識起見而發生的主觀的觀念，文化本身上沒有這回事，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差不多——我不說科學的，因爲馬克斯的經濟

讀本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後



學說還是學說，——可以說，物質的表現就是精神的表現，反過來說，或是換句話說，我們差不多可以說，精神的表現就是物質的表現。——註「這句話是我說西洋文化是整個的，根據我過去的著作裡隨處可找出，而且是我主張精神物質不能分開是一個必然的結論，張先生拾了以爲至寶，已是可笑，今反質難于我，寧非太妄？」

所以，「只」知道「西洋物質」文化，原是中國文化園丁的一種簡單思想，西洋「無論是」精神「物質」文化原跟人走的呢！——註「張先生有原不肯隨便跟人走的呢的話，大概肯跟上帝或魔鬼走罷！」中國二千年來，正因爲陷在「固有的單調文化裡，一方面專制思想——「互相」依存於傳統勢力的——的淫威，便根深蒂固；一方面就所謂「物質與」精神文化停滯不進；所以，目前中國文化運動最迫切的工作，要把「固有文化」整個改造，所謂現代化，然後有現代的文化。否則中國文化永無出路可尋，只有在死路上徘徊而已！

「張先生」既然知道，「專去採取西洋物質文化不但是一件行不得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我們若只喜歡住洋樓，而不求做洋樓的材料和方法；只喜歡坐汽車，而不求做

汽車的材料和方法；只喜歡坐汽車，而不求做汽的材料和方法；結果只有消耗而沒有入息……「請問「張先生」常在現代青年發表文章的時候，幾曾一想起及此？也幾曾已立立人？」張先生的入息在那裏？這樣言行不一致和矛盾，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至於我呢，是主張社會分工合作的，各人只要能夠盡忠其所業，不必像張先生所主張人人都做汽車造洋樓才有資格去享受，所以言行並沒有矛盾過。」

還有「張先生」明明白白「說道」「不是一位極端的左傾者……」但是，你雖不殺伯仁，伯仁由你而死。你那樣籠統地主張「經濟基礎」，青年們的盲目的崇拜「左傾」，是勢所必然的。至少現在趨左傾的青年們，會說是「先生」的「同志」呢！所以，這種關係是脫不了的。所以「你」站在青年面前「做文章」必須三思而後行啊！

還有，「不」奇怪的，「常常」放其

機關槍——浪費了許多無謂的子彈。

實在呢，弄巧成拙，反自己打自己嘴巴。

「你」說了，你是指導鄉村民衆生產運動者，罵人不做這個運動，而在這個觸目驚心，消耗鄉村金錢的城市。我便說，「你對於這個觸目驚心的城市反對到這麼利害……爲甚麼不跑到農村裏……而偏偏跑來都市……」這實在是「有理」的反駁，「尊嚴的勸告。」我所以「這樣說，原是要指出，「像先生這樣主張救濟鄉村民衆而也不身體力行」的大危險。「這樣方式的運動」不免滑稽，「無怪一無成效」！這個呢，原是一般不言手段，只標目的地籠統的「救濟民衆」運動者所應得的酬報，於我何有哉！

最後，又涉及「教席」的問題。不錯，「我見你有時喜用新聞學院的名來宣傳你的文章，像草于新聞學院等話，我就以爲你是教新聞學者，你既承認不是教這個，又何苦用新聞學院等話來起人家的誤會呢？，各有攸歸。」

「我」又問「你所求的學問，既不是爲學問而求學問，那麼，那種學問，除了舞文弄墨，從事宣傳外，又給社會民衆多少利益呢！」「你」的回答是：「你」却不想做專家博士之類。「這個回答，本來是牛頭不對馬嘴。然而最使我——也許是許多人肉麻的，是你說你」有「

個坦白的心。原想——註「確有思想」——背着十字架來向民衆贖罪。「我問你除了用這話來瞞民衆和青年外，你不但未有去實行你的主張；就是向着他們贖罪，也講不上背十字架！」話「套」得遠了，就此住筆。

末了，我希望「先生」的「什麼」運動，第一，要自己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勿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第二，要對於過去西化運動的事實背景得失，要先有相當最低限度的研究，「然後可下批評」，勿事糊塗瞎說，以至未見成效，先見敗徵。非然者，我們何須多言？

二月五日

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再答張磬先生

陳序經

『這篇文章叫做——一個不得已的答辯——』曾寄給現代青年的編者請他發表，使讀者可以最少知道我方也有得說的話，後來因爲該報改組，沒有拿來登載，所以遷延到今，始在這本小冊和讀者相見。（作者附誌）

我在民國日報現代青年欄發表了那篇「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一文以後，張

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再答張磬先生

先生又發表了一篇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我一文，此外他還在該欄發表了一篇「爲中國文化問題再進一解」和一篇「中國復興教育運動宣言」！我閱了他前後所發表數篇文章的錯誤和矛盾處，舉不勝舉；當別爲文以指摘之。理論上的張先生固是「心勞日拙」，他對於我個人的方面，又生出不少的誤會之點。所以我不得不再借現代青年的篇幅，對於這點，略爲解釋，使現代青年的讀者，明白這件因學術的討論而涉及個人的公案的真相。

張先生劈頭就說我的駁論的態度上未免失了尊嚴，這是一種誤會。張先生自己忘記了他自己太不尊嚴了。這種太不尊嚴的態度，是在張先生的文章裡，處處可以找出來的。比方他前年在「娛樂教育」裡說：

娛樂教育，神仙們！請睜開眼睛看看吧！中國社會上有大多數同胞還「沒得飯吃」呢！中國社會上有大多數同胞還「目不識丁」呢！「一將功成萬骨枯」，萬骨枯了，功在何處？大學教育破產，已成社會上一致的輿論，請問貢獻了些甚麼呢？

事實上，今日中國的大學裡的教授學者的生活，並不像張先生所誇張的那樣舒服。何況薪水可以時時不發足，位置屢屢可以動搖，以及種種的不良待遇，曾經在過專門學校的張教授，也許會嘗過這種味道。什麼「神仙們」，什麼「娛樂教育」，試問在「學而優則仕」的「文明古國」裡，有了幾多人是願意去過這種生活呢？

張先生又處處一筆罵盡一般學生，學者，教授，博士，碩士，爲特殊階級，爲不勞生產而安然獲得生活資料，可是張先生自己却又忘記他曾在過專門學校的新聞學院當過教授，享他所謾罵的「神仙」生活，而同時所謂提倡生產教育最力的張先生，除了在現代青年和各種刊物生產很多文章以外，又何嘗是勞力生產而辛苦獲得生活的資料呢？這樣的張先生，不但是不尊重他人的生活職業，而謾罵他人，他簡直就是不尊重了他自己，而謾罵他自己了。

我是見得張先生責罵他人到這麼利害，而且是一位提倡生產運動最力的人，所以勸張先生「自己以身做則」，無非希望張先生的計畫，能夠施行，而且能夠成效。到了那時，也

許我會被了張先生的感化，而放棄我個人今日的職業，來跟從張先生的主張。所以我這年餘以來，有時無意中領略了張先生所提倡的生產事業，雖有時會懷疑張先生所提倡的人人要從事生產的主張，是否能夠實現，而且在文化進步的社會機器昌盛的時代，要不要人人都做同樣的生產事業而沒有分工；然我並不因此而來批評和指摘張先生，其原因是：一來，我自度對於這個生產計劃的研究，沒有深刻，不敢亂事批評。二來，我尊重張先生的主張，希望他自己能夠不爲理論上的非議而多把時間來試驗施行。我希望張先生不要在這「觸目驚心」的城市，要到有產可生的鄉村，就是本於這種意思。像我這種的態度的尊嚴的，恐怕是再沒有了。張先生誤會了我，不但不實現我的希望，反以爲我這樣的希望，是攻擊到私人的生活，那豈不是一種誤會嗎？

張先生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我一文裡說：

陳博士既然知道「專去採路取西洋物質文化，不但是一件行不得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我們若只歡喜住洋樓，而不求做洋樓的材料和方法，……結

果只有消耗而沒有入息。」請問陳博士站在青年面前演講的時候，幾曾一想起此，也幾曾「已立立人」。陳博士的入息在那裡？這樣言行不一致和矛盾，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嗎？

這個反駁真不值得閱者一笑的。事實上張先生正是「弄巧成拙」了。張先生要明白我不是一位像張先生所主張人人要做物質的生產的人。我是相信社會分工的人，而且相信在一個複雜的社會，要是人人都要去做衣食住行的物質的生產事業，像張先生所提倡的，那麼結果不但是沒有維持治安的政府的人員，就是治理病人的醫生，以至一切的像藝術家，新聞記者，和張先生所自命的「我們負領導青年職責的教育者」（張先生最可笑者是明明自命為領導青年的領袖却硬說是我和他爭這一席我不知其何所據而出此）也要廢除。這不但不是我所主張的社會，而且是我相信一個做不到的社會。我既相信社會的形成，應有而且事實上不能不有各種像醫生藝術家學生教授，我目下是在大學當教師的人，我只求所以盡忠於這種職業，就能無愧於心。何況就使我而是一位汽車生產者，我必不能同時是一位製衣

者，耕田者，建築者，……結果雖是能做汽車而後坐者，還是一位沒有耕田而食者，沒有製服而衣者，……。我常說：人類在社會裏的需要很多，每一個人能對於某種需要上盡力從事，而滿足他人與自己的需要，就算盡其所能。因為盡其所能，也應得其所需。社會是分工的，互助的。所以我雖像張先生一樣的住洋樓，坐汽車，然並沒有像提倡人人要生產而自己却不去生產的張先生的言行不一致和矛盾。

張先生問我的入息在那裏。我也還問張先生道：提倡生產事業的張先生的入息在那裏呢？其實我的入息，未必會多過張先生。我除了嶺南的薪水外，並沒有別的入息，而且像我這樣少到城市，少坐汽車的人，也用不着很多的入息。我在嶺南所教的科目，既不是中國文化的問題，我年來在協和大學和中山大學所講關於中國文化的問題的科目，全是友誼上的幫忙。正式薪水我固沒有，送來的舟車費，我也不要而退回。所以名義上，在協和和中山我固是教師，事實上我還要把我在嶺南的薪水來做舟車午餐費，而像一般自己拿錢去研究學問的學生一樣。所以我對着協和和中山的青年們談起中國文化的問題和我所主張的

全盤西化，並沒有對於良心不住的地方。至少我不會像張先生一樣的拾周予同先生所說的「原想（！）背着十字架來向民衆贖罪」的肉麻口號，來欺騙民衆和青年！

至於張先生因我推料他是教新聞學者，所以「笑痛了肚子，」我聽了之後也笑不可當，雖則未至於肚痛。原因是張先生所服務的新聞學院的本身，就是西化的教育機關。何況張先生既不是教新聞學者却歡喜用了「草于」新聞「學院」一類話來宣傳他的文章呢？

又如因為指摘他的經濟史觀，是西洋人的思想，他又硬說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老調是從胡適之先生處脫胎而來，這又只見得他的「心勞日拙而已」。

總而言之，張先生自己也是教授之一，新聞學院的教授都會做過，那麼別的專門學校或大學若請了張先生做教授，張先生未必就不做。若是萬一過去有些專門學校或大學，曾因張先生之尋一枝棲而閉門拒絕，致張先生逢着專門學校或大學的學生教授們都要大發牢騷，那便未免太過用意氣了。不但這樣，張先生也承認自己的思想行爲，是受過西洋的影響，而張先生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我一文且滿口用了什麼毒瓦斯……等等西洋名詞。我

未知張先生之所以至此，是直接的自己從西文輸過來，抑是間接的從學者教授們的教科書翻譯本拿過來呢？若是直接的，那麼張先生還是自己到外國學回來，或是從學者教授學得來。若說是自己到外國學來的，那麼自己也是外國留學的特殊階級了。若說從學者教授學了西文，能夠直接看外國書，或是從他們的教科書和翻譯本而得到的，那麼張先生飲水思源，也算罷了，現在還要把從學者教授們所得到的餘唾，而謾罵譏笑學者教授，張先生不但太不自量，而且捫心自問，怎能過意？何況張先生本身曾做過教授呢？

末了，我記得前年張先生在「娛樂教育」一文裏曾說過：

歐美人自覺的，中國人糊塗的。

我主張全盤西化無非要想中國人要自覺的不要糊塗的。而且要全盤澈底的自覺，不要半點絲毫的糊塗。張先生反對全盤澈底的西化，是不是還要中國人這樣糊塗以終，或是留存着多少糊塗劣性呢？一般盲目的中國人，不明白歐美人是自覺的，中國是糊塗的以致不能自覺，糊塗以終，猶無足怪；張先是知道這個分別的人，還要反對效法西人之自覺，而躊躇徘徊於糊塗之途，是亦糊塗中之糊塗者歟？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和澈底的西化』的批

評

馮恩榮

前幾天讀了張磬先生的『中國文化的死路』以後，已經令我們覺得不勝詫異，覺得他的淺陋的成見，實在很深。詎料讀廿三年一月二日『現代青年』所載張磬先生『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一文，要禁不住站在讀者的地位來忠告張先生。

張先生從經濟的觀點上來解釋文化，未嘗沒有片面的道理，本非絕對無可討論之點。然而他竟以戲罵的態度出之。在我們讀者，方為張先生抱十二分的惋惜，而他自己却還以『負領導青年職責』自命，真是何等的大言不慚！

我們對此胡說，只可置之不理。現且評評一月卅日王峯先生的『評陳序經先生的中國文化之出路』，和二月一日林潮先生的『評陳序經博士論中國文化之出路』那兩篇大作吧。細讀王峯先生那篇的立論，正和張磬先生前後兩篇一樣，同是從經濟史觀出發，來証

明文化完全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上頭。

關於這方面的批評，已見之於廿三年一月廿九日陳序經先生所著「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一文裡。他已經很清楚地說出馬克斯那種經濟史觀的原委，並且指出單以經濟的原因來解釋文化，是最容易陷於錯誤的途徑。只要不是成見太深，總會明白的。

無奈王峯先生對於這個經濟史觀，好像是牢不可破，他並且拿那個辯証法，應用到西洋文化的問題上，以為近代的歐洲文化，也是建築在唯一的經濟的基礎上。他告訴我們說：

歐洲現代文化，誰都知道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映……所發生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都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社會而起！

其實，稍曾讀過西洋近代史的人，理該要明白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至政治革命，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歐洲那些的改革運動，都有了很長遠的歷史，如果沒有希臘，羅馬，基督教那二千多年的孕育，是產生不出來。又如十二十三世紀歐洲的大學運動，中世紀末葉歐洲各民族的自覺，列國的成立，城市的興起，十字軍的東征和元朝的西征

，都是產生歐洲近代文化，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政治革命的主要原因。難道那些教育的，心理的，政治的，經濟的，交通的種種文化的各方面都只是受制於經濟的一個原則嗎？

「經濟的本身」，誠如陳序經先生所言，「是文化很多方面的一面。經濟的勢力，固然可以影响文化的其他方面；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勢力，也常常影响及經濟的制度和觀念。」文化是整個的。這個道理，王先生還未懂得嗎？很複雜的歐洲文化的現象，何以偏偏只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映？

不錯，歐洲自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即乘時發達。但文化的其他方面如科學，文學，教育，政治，社會，又何常不因之而同時發達。資本主義固足以影响文化的其他方面；文化的其他方面，亦何嘗不可以左右經濟的思想。資本主義固是近代歐洲文化的特徵，但「德謨克拉西」也何嘗不是近代歐洲文化的特徵！

王峯先生也許又這樣告訴我們說：「德謨克拉西」也原是資本主義的產物。那麼資本主義是什麼的產物？何以中國數千年來也產生不出資本主義，和德謨克拉西呢？

如果王峯先生也和張馨先生那樣告訴我們，因為「紡車產不出電力啊」。則我還要問：「紡車」與「電力」是不是從天外飛來？那都是從人們的頭腦產生出來啊！

假如我們要改造中國幾千年來的紡車的頭腦，則除了全盤和徹底的西化又有什麼途徑？假使我們以上對於歐洲近代文化的歷史看得不錯，假使我們對於文化整個的原理解釋得不錯，那末，王峯先生那個以經濟史觀為大前提，自然不能成立，其於歐洲文化的認識上，也就不得不隨之而錯誤了。

王峯先生要站在這樣不穩固的立場上，進一步來解釋東西文化。他斷定西洋文化已經到了一個「沒落」的時期，來證明西洋文化之「不可移植到中國」，復以為中國沒有那個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以見西洋文化是「不能移植到中國」。錯謬的論據，產不出正確的結論，那是自然的。但最錯謬的是他對於整個的中國文化，却是一點都不提及，既沒有比較，又沒有分析，便惴惴然為西洋文化抱杞憂，宣佈西洋文化的末日。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疏忽。

世間也許沒有絕對的美滿的東西，西洋文化有了牠的缺陷和困難，是我們所承認。然而稍曾做過東西文化比較的工夫的人，誰都要承認西洋文化的優點多於中國文化的優點。生產過剩的血管破裂，不是比沒有生產的貧血和麻木來得痛快嗎？何況近年歐美上下一心的「復興運動」，已經見了相當的成效？「沒落」云何哉！資本主義固是有牠的缺點，可是資本主義未必一定沒落，即使資本主義而沒落，西洋文化却不會沒落。

西洋文化是「不能移植到中國」嗎？然而梁啟超先生早就告訴我們，這五十年的中國進化史，是一部歐化的維新史，而這個歐化史的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時期。（參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二三六頁，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

最後王峯先生否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根本是西洋的東西。」我們得請他快讀「總理全集」。

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泊自其帝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

起，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年百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見總理全集第一〇三二頁民報發刊詞。）

王峯先生，那些籠統的地方，隨處可發見。例如說陳序經先生曾在『獨立評論』發表過，『中國文化之出路』，『內容和這次的演辭無甚出入』等語。依我的記憶，陳先生在『獨立評論』，並沒有發表過這篇文章，而是別的問題。

話已走上歧途了。讓我們談談林潮先生那一篇吧。爲了篇幅所限，畧爲言之。

林潮先生的主張是好一個折衷辦法的代表，他的結論是：

依中國環境需要，以定西洋文化之吸收種類及吸收程度，以定本國文化的基礎。

執環境一說以見西洋文化，在許多方面，是不適宜於中國國情，來斷定全盤和澈底的西化之錯誤，是昧於文化整個之理，和未澈底研究過中國現在的環境的原故。

所謂文化是整個的，究竟是什麼意思，林潮先生這樣問。

我們常常這樣說，文化的各方面都有了密切的關係，一方面的波動，每每影响到別方面去。同時文化的某一方面的發展，是每每受這種文化的水平線的限制。由前之說，則改造文化的某一方面，必不能不改造別的方面。如此類推，其結果是要全盤和澈底改造而始可。由後之說，在某種低下的文化之下，要想這個文化中某一二部特別的優高過其他的部份，是很不容易的。這正像孫中山所說，美國教育辦得好，是由於美國的文化的其他方面，如工商業和一切社會事業，都比中國進步的多。

「固有中國文化，是自成一個系統的，自成一個圈圍的，所以固有的中國文化，像政治，經濟等也有了密切的關係。西洋文化也有了他一套，牠的政治，經濟等，也有密切的關係。自東西文化接觸，中國人感到事事都不如人，同時又不能閉關自守，而保存固有的文化，結果是固有的中國的國情，已不適合新的時代。整個文化既是不適合現代的环境，則整個文化是要現代化了。若說中國的國情，或化文的某一部份，或好多部份，是合乎新時代，那麼這一部份或好多部份，已變為現代的需要，而非中國的獨有，或固有的需要

了。」

「不錯，國情，或環境兩個字，雖可以包括一切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人種以及文化的情況，然而事實上所指明的，却只能說是文化的一方面。我們承認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上的不同，固然可以影響及教育制度，然在文化進步的社會，這些東西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而且事實上中國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和西洋先進的各國，並沒有多大之差別。」（參看獨立評論第四十三號，陳序經先生著，「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一文）

我們以爲主張折衷的最大的錯誤，正是以爲現在的中國的國情，還是中國的固有的國情，他們忘了我們一切的政治，經濟，禮教都已朝着新時代的途程中，主張部份的不澈底的西化，豈不就是採了新的制度，來適合正在變換中的舊的政治經濟或禮教以及這些產生的結果？試問何以不專去保存固有的文化，却要多生枝節的，去採納西洋文化而徒勞無益呢？

折衷辦法的謬誤，不只是本身的謬誤，而且生出最大的危險。這些危險，比之真實的復古爲尤甚。原來真的復古那些簡單的物質生活，還可以減輕利權的外溢，然而折衷派的人却是享用西洋的物質文明，而骨子裡仍無半點的西化，這真是時代的投機者，文化過渡時代的蠹蟲，人類的公敵。

評中西文化討論的折衷派

呂學海

自從陳序經先生的「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辭在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欄發表之後，便引起了一場很燦爛的文化論戰，參加這個論戰的大約不外兩派人物：一派是西洋派——主張全盤西化的；一派是折衷派（？）——主張部份的西化的。前派的代表有陳先生本人和馮恩榮先生；後派的代表有王峯先生，林潮先生，張磬先生，陳安仁先生，何汝津先生，王衍孔先生，穆超先生……。王峯先生和林潮先生的理論的不澈底和畸形，大致經已由馮恩榮先生指出；張磬先生的見解的謬誤，亦已由陳序經先生糾正。現在還有陳安仁先生的

『中國文化的生路與死路』，和繼起的何汝津先生的『文化問題中的幾個具體問題』，王衍孔先生的『東西文化的分析』，和穆超先生的『中國文化的特質』那幾篇折衷派的文章，尚沒有人拿來批評，作者爲了想一般人明白我們的主張——『全盤西化』的澈底和折衷派的理論的矛盾起見，現在且拿陳，何，王，穆，那四篇文字的理論的謬誤，畧爲指出：

I 主張折衷採用西化的陳安仁先生說：

中國的文化有所長，也有所短，其長的要保存，其短的要放棄，……我們中國有何種固有的優良文化要保存呢？說到中國固有的優良文化要保存，是一言難盡的。茲具體而說：中國的文學優美，這是世界許多學者所稱道，而文學的保存，是民族生存應該注意的條件，也是民族文化的特徵。

不把中國文化的長處提出也能，一提出便碰釘子了；假使沒有比較，自然是『惟我獨尊』，可是中國的文學一拿來同人家比長絜大，恐怕沒有比較的餘地。韓柳歐蘇是什麼人？Shakespeare, Francis Bacon, Dante……又是什麼人？中國固有的文學，簡直是死的文

學，是滿載着死者——古人——的話，絕少有作者的個性的表現；所謂文學家大都是以古人的說話爲自己的說話，以古人的個性爲自己的個性。夫文學之所以爲文學，在其爲作者思想的結晶和其性靈的表現，然後有活氣，有骨氣，否則便無文學可言，縱有都是死的文學而已。中國文學之不足與人家比美，慨可想見。假如中國的文學真是比人家的優越的話，人家也自然懂得「其短的要放棄」而來效做中國的文學了。說世界許多學者稱道中國的文學，我們不免要問那「許多學者」究竟是誰人呢？我們須知道，世界更多學者稱道西洋的文學呵！況且，稱道我們的文學或甚至研究我們的文學是一件事，而採用或模倣我們的文學又是另外一件事，人家儘管稱道我們的文學的優美，但人家終于不肯上當來效法她罷。

進一步言之，照陳先生的意思，以爲中國固有文學是這麼的優美，和這麼的值得保存，那末，胡適之先生們所幹的「文學革命」運動，都是多事了；誰信？

魯迅先生說得好：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

——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只要留心讀過相當中西書籍的人，總不會否認上面這段話的真確的，文學的表現在「書」，中國書的估價如此，她的文學的價值如何，也可想而知了。保存云何哉？

陳先生又說：

可見中國的文字文學，與及所附麗之歷史學哲學藝術學要保存的。

這裡陳先生是根本的弄不清楚文字文學究竟是什麼的，所以謬然把歷史學哲學藝術學都附麗在文字文學上去；須知文字文學，只是文化之二部份，歷史學哲學藝術學也只是文

化之數部份，同爲文化要素，後者何能附麗于前者——文字文學？

陳先生又認爲中國的固有道德是要保存的，他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道：

「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舊道德，固然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要保存，并且要發揚光大。」這種種固有道德，也是要保存的。

恐怕孫先生的意思，不會像陳先生的解釋罷。記得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孫先生對嶺南學生歡迎會的演說詞「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裡有這麼幾句話：

美國近幾十年來尤其進步，他們國內的情形，不但是教育辦得好，就是工業商業和一切社會事業，都比中國進步的多。中國的一切事到了今日，可說是腐敗到了極點，腐敗的原因，是在人民過于墮落。

中國幾千年以來，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個人，爲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

達人群，爲大衆謀幸福。（胡漢文先生編總理全集）

孫先生于民十三年在嶺南大學黃花崗紀念會也說：

現在文明進步的人類，覺悟起來，發生一種新道德，這種新道德，就是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衆人來服務，這種替衆人來服務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七十二烈士有許多是有本領學問的人，他們捨身救國，視死如歸，爲人類來服務的那種道德觀念，就是感覺了這種新道德的潮流，諸君今晚來紀念七十二烈士，要知道不是空空的來紀念，要學他們的志氣，尤其要學他們的道德觀念。

○（胡漢民先生編總理全集）

我們細讀上文幾段話，便可以察覺到孫先生的根本的思想的一斑，陳安仁先生也許知道是誤解了孫先生的意思罷：「保存中國固有道德」云何哉？！

陳先生又以爲中國的建築飲食是要保存的，他說：

建築飲食，也是文化的表徵，中國宮殿式美觀的建築，（如金大南大的最近新建

築）調味素備的飲食，也是有所長而要保存的。

可是，事實上，所謂中國宮殿式美觀的建築，（如金大南大的最近新建築）已不是中國固有文化的表徵，而是採用西洋方法和材料後的產兒了。否則，此種建築恐不會在現代能夠美觀起來，也不會使人們居住而覺得舒服。所謂繪則，現代工程學識，佈置方法，和甚至工程師或建築師的學問與課本，何一不是由西洋輸過來的東西？

講到飲食問題，我們首先要以適合衛生和有益身體，乃是最要的問題，從這方面看起來，中國人的飲食，遠不若人家的講究。許多人聽聞西洋人恭維中國的飲食，便以為「人不如我」；但是為什麼終不見人家採用中國的飲食呢？甚至就一般在中國宣教或居住的西洋人來講，試問那位是採用中國的飲食的呢？

縱使西洋人住中國的建築，用中國的飲食，也不過是為暫時的便利或好奇起見，作偶然的嘗試而已，并非因為它是中國文化之所謂「長處」（？）而採用的。

陳先生繼續說：

在民族主義第六講有說：「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這也是要保存的。

這裏，陳先生也好像誤解了孫先生的根本意思；所謂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這原來是中國古時的事。但時至今日，我們拿這種政治哲學來重新估價，來與人家的比較，便發覺中國古時的很好的政治哲學，不是今日的很好的政治哲學了。就事實來講，我們孔家的修齊治平……政治哲學，那比得上人家的亞里士多德，盧梭，孟德斯鳩，……的政治哲學的完全？還恐怕沒有比較的餘地罷。孫先生明白這個，所以三民主義的政治哲學，根本是西洋的思想，并非中國固有的。這點馮恩榮先生經已細指出，不必再述。

我們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們常說：

要是人們還以為中國文化有好的東西是要保存的，請指出來。

這個問很少得到反應，現在陳安仁先生就做了個嘗試了，可是陳先生所指出來的幾件

好東西——文學，道德，建築，飲食，政治哲學——一經拿來和人家比較，一經拿來重新估價，已不是好東西，已是毫無值得保存的餘地了。

我們再要問折衷派的人們，中國固有文化，還有那一點長處值得保存？

我們也許應當鄭重聲明，我們反對保存中國文化，我們並不反對研究中國文化。陳序經先生七年前在他的「再開張的孔家店」一文裡；經已把這個道理說明白，他說：

我們雖然反對把孔子的學說來支配現在的社會，我們並不反對人家去研究孔子學說。爲學問而研究學說是一件事，要把一種學說來支配一時代的行爲，又是一件事；我們對於前者，不但不反對，還極贊同，不過同時我們應該記得，研究學問也有急緩之分。對於後者，我們相信孔氏的主張，已不合于我們現在的要求，而是根本與我們所要求的相反對。我們若不勉力去阻止他的實施，那麼中國今後的政治文化的趨勢，恐也不外是過去專制淫威的再生。

講到西洋文化高過中國文化，陳安仁先生也承認，他說：「的確，現代西洋文化比我

們中國高明許多。」

更進一步，就西洋文化的任何方面，拿來同中國比較，都比中國文化的任何方面高明許多。人家的長處，長過我們的長處；人家的短處，短不過我們的短處。西洋博愛的觀念，遠勝過中國「仁」的觀念。一本國際公法，一本社會主義，也遠勝過萬篇禮運大同；講到治國平天下，「半部論語」，何能比美一本法意，契約論或君王論？再就彼此的所謂短處來講，人家的軍國主義，也遠不及畏怕抵抗主義之沒有勇敢和廉恥；跳舞好過搓麻雀，離婚好過納妾侍，含雪茄也勝過吸鴉片煙。

要是我們肯虛心承認事實的話，我們還有什麼堂皇的東西可以向人誇耀？因此，陳安仁先生這段話：

的確，現代西洋文化比我們中國高明許多，然不能說西洋文化均好，而我們中國文化通通不好……世界文化之發展，全在吸收各國家各社會各民族的優良文化。以產生更優美新異的文化。

我們應爲改讀如下：

的確。現代西洋文化比我們中國高明許多，我們若平心靜氣地計量比較中西文化之異同，我們不免發見西洋文化均比我們好，而中國文化通通不好，……中國文化之出路，全在首先努力全盤吸收各國家各社會各民族的優良文化，而具此優良文化的各國家各社會各民族是在西歐，故我們要全盤西化。先做了這翻基本工夫，我們然後配談再產生更優美更新異的文化。

Ⅱ 其次，我們可把王衍孔先生的思想，稍爲商榷：

王先生也是折衷派中人，他承認「西方的物質的豐滿主義是無可非議的」，他說：你看他們的衣食住行罷！與他們的合理而有美觀的生活比較之下，便覺得我們的生活不獨無條理而且醜陋了！

但是王先生又以爲西方的精神生活有其缺點處，所以他接着說：

至于西方的精神生活的變化主義，固能令人對於一切事物，有豐富精密的認識上

駕御環境有敏捷穩健的能力；但機智精巧而心地不純樸的人，每詭計百出，私心極重。有利可圖的地方，無論手段如何殘酷卑劣，亦不惜爲，所以現時的西方社會雖有組織，而實以個人的利益爲前提。

王先生這翻話是很謬誤而沒有什麼根據的。講到「詭計」，講到「私心」，我們要是稍能反省，自己照照鏡子，我們就知道沒有資格責備人家的。甚至在國難當頭和抵制劣貨運動的期間，還有所謂漢奸，奸商，和什麼包辦……什麼……層出不窮，在這樣的嚴重的時候，還是詭計如故，私心如故，平時更無論矣。我們還有什麼堂皇的話可說？我們多詭計還是人家多詭計？我們私心重還是人家私心重？我們的手段殘酷卑劣還是人家的手段殘酷卑劣？大家平心去同人家比較，總覺汗顏！西方的道德是怎樣？我們的道德是怎樣？上文經已畧爲說過，不贅于此。

若說「機智精巧」是西洋文化的病癥，那更不通。我們知道人類是比之動物爲機智精巧的，故人類能征服動物，征服自然，創造文化。我們越機智精巧，越能擔當或應付大事。

我們在現代的世界裡，若不努力於機智精巧，而徒像豬羊般的純樸馴良，怪不得日本能以很短期間的功夫，征服整個滿洲！

王先生對於西洋文化最不滿意的地方如彼，然一經分析，一經比較，人家的短處，就是人家的長處了；我們還有什麼堂皇的話可說呢？

III 其次，我們要批評的是何汝津先生的見解，何先生也是折衷派中人。他明知中國整個文化都不及人家，然對於中國文化仍有所留戀，他既知道我們「應坦白的承認這一種表現宗法封建社會商業資本社會意識形態的中國舊文化，是不能與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抗衡的。」但他却主張「整理國故」，其原因不外是：「假使中國民族是不會滅亡的話，那麼中國未來的新文化，一定不是歐美資本主義的文化，也不是蘇俄社會主義的文化，是有她的獨特的文化的；而這種獨特的文化，也不能不包含着舊文化的原素，這就是要一部人努力去整理國故的理由。」這個原來就不成理由；何先生好像是昧于文化發展和變換的道理的。須知過去不適時宜的東西，就已成為文化史上的陳跡了，雖經整理，然「國

故」仍是「國故」，何況何先生自己也曉得說：

「不要以為還可以在中國舊文化廢墟裡，故紙堆裡，找出超出現代文化的學術思想來。」？

至于研究國故或中國舊文化，我們原無非議的，不過還去把她保存拿來施用，我們就根本反對的。這個道理我們在上文經已說得很明白。可見這種種的折衷辦法，總是行不得的。

IV 最後，是關於穆超先生的「中國文化的特質」一文。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讀了他的文章好似未讀，一無所得。他那篇文章之四份三好像是從徐慶譽先生著的「中國民族與世界文化」（民國十七年一月，世界學會發行）鈔過來的，現在只可從略，不去批評。奉告投稿諸君，大家稍為注意做文字的責任心和道德心罷！

總之，我們主張全盤西化，我們是想替中國文化找條較好的出路而已，我們並不是說西洋文化是盡善盡美，更不是說西洋文化是個理想文化，我們只承認西洋文化在今日世界

諸文化區域上，是個較好的文化罷了。我們承認事實上世間並沒有也許永不會有十足完美一無缺陷的文化的實現；因為使世界的文化而真的沒有半點缺點了，那麼，世界文化也再不會進步，實言之，文化沒有半點缺點之日，也許不是地上的文化了！

所以我們主張全盤西化，純是就事論事，純無半點烏托邦之思想，無苛求，無奢望。最後，我們還好伸說幾句：現在還有許多人懷疑全盤西化會生出危險來，他們以為文化亡民族便隨之而亡，其實這個見解是很顯明的謬誤的，我們且援引陳序經先生這段話來說明：

反對全盤採納西洋文化的人，以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文化成爲民族之生命。他們的結論是：文化亡，則民族亡。這種意見的錯誤，是在于不明瞭文化乃人類的創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見之，然他的真諦，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創造文化。過去的文化是過去人的創造品，時增變了，我們應當隨着時境而創造新文化，否則我們的民族，只有衰弱，只有淪亡。（見氏著

「中國文化的出路」今年一月商務版）

所以主張全盤西化，並不是（更不會）使我們民族的運命陷于斷絕之途，反之却不外是把我們民族的運命更生罷了。

民二三，二，廿五日于嶺南大學爪哇堂。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

陳序經

自我的那篇中國文化之出路講演詞在民國日報的現代青年欄發表以後，有了不少的人們對於我們所主張的全盤西化的理論，沒有充分的認識而生出不少的誤會起來。爲了說明我的立場起見，我曾把人們懷疑全盤西化的要點，約分爲三十條；擬逐條解釋，題爲「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我初意本想完成這篇文

章，但是一來因為課務及他種工作相纏，沒有空暇去寫作；二來有些爲人們所懷疑的要點在呂學海和馮恩榮兩先生的文章裡，已略爲我說；三來我最初希望民國日報的現代青年的編者，對於我上面「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再答張磐先生一文」能夠先事登載，然後陸續寫成這篇，在該欄發表；可是那篇文章寄去有月，該欄編者好像不願意發表，我對於這篇文章的寫作，也因之而中輟。近因學海先生編全盤西化言論集，催稿甚急，我不得已，只能把這篇尚未寫完的文章以爲塞責。

（一）中國問題與文化問題

我相信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我且相信這個結論就是一般偏見很深的人們也不能否認；比方張磐先生在爲中國文化問題再進一解一文裡雖告訴我們：

謝扶雅教授也承認文化要受下層經濟結構所決的原理，這比陳序經博士說的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自然高明得多。

然而在「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一文裡他却承認：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

經濟本身也是文化的一方面。

張先生是極力主張中國的問題是經濟的問題的，但是既然承認經濟本身也是文化的一方面，那麼；他就不能不承認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文化的問題。

原來文化本身是整個的，人們把她來分開做物質，社會，精神，或是宗教，道德，政治，經濟，藝術……各方面，無非爲着利便研究與認識起見而發生的主觀的觀念，文化本身上却沒有這回事；因爲她本身上沒有這回事，所以各方面是互相連帶，互相影響，無論那一方面的波動，都會引起別的方面的波動。

因爲文化本身是整個的，是不能分開截斷的。所以我以爲中國的問題根本是整個文化的問題的真理，因爲張先生所認識未到之處，張先生所主張的中國的問題只是經濟的問題的一知半解，却跳不出我所畫的圈子，何況他自己又承認經濟本身也是文化的一方面？實言之，經濟的問題只能當作中國好多的問題之一，此外政治上的腐敗，教育上的落後，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的沒有進步，都是中國之所以弄到這個田地的原因。張先生在中國復興

教育運動宣言裡，於所謂解放經濟上的侵畧的生產教育之外，還極力提倡民族意識和軍事教育；可知張先生於無意中或有意的已不承認中國的問題只是經濟的問題了；又何況張先生所提倡的所謂解放經濟上的侵畧的生產教育本身上，就是教育的一種，而非張先生所謂純粹經濟的勢力呢？

（二）文化基礎與基礎文化

這個中國的問題的觀點的誤會，是和文化的基礎的觀點的誤會有了密切的關係。

以經濟爲文化唯一的基礎的人的錯誤，正像歷史上或現代一般專以道德或專以宗教或專以政治爲文化的唯一的基礎的人一樣的陷於錯誤的地位。以道德爲文化的唯一的基礎的人，像辜鴻銘，像斯維塞 Schweitzer，以爲文化的改造完全要從道德着手；以宗教爲文化的根本的基礎的人，像顏特 B. Kidd，以爲文化爲改造完全要從宗教着手；以政治爲文化的根本的基礎的人，像古代的亞里士多德和近代一般的政治學者和政治家，以爲文化的改造完全要從政治着手；這正像一般以經濟爲文化的唯一的基礎的人，以爲文化的改造完全要

從經濟着手一樣。他們的錯誤，就是忘記了所謂道德，宗教，政治，經濟，的本身就是文化。文化的本身既是整個的，不能分開的，那麼，無論那一方面的改造都會波動到別的方面。同時，無論那一方面的改造都受別的方面的限制。十餘年前對於這個道理能夠明白者很不容易找出來，所以有的道德家大聲疾呼以爲道德苟能講究，文化問題就可轉瞬解決；有的宗教，政治家，經濟家，各人以爲苟能使他們各個人所主張的信仰標準，或是政治意見，或是經濟計畫，把來施行，就能使整個文化的問題迎刃以解。十餘年來研究文化的工作較前進步得多，人們始感覺到每個文化的改造，並非專從某一方面着手就能奏效。因爲文化這個東西，並不是這麼簡單的，換言之，某種文化的本身，就是這種文化的改造的基礎。張謇先生彷彿好像見到這個道理，他說，

紡車上產生不出電力，

他又說：

凝定了的舊文化對社會有其惰性的反作用，而沒有基礎的新文化對社會只有相當的

影響而已。

這個認識本來是和他以經濟爲文化的唯一的基礎的論調相抵觸的；正像他在上面一方面堅持中國的問題完全是經濟的問題，一方面又承認經濟本身乃文化的一方面，而同時不相信我說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的見解一樣的矛盾。

紡車上產生不出電力，我也許可以同情於張先生，文化是築在文化的基礎上，張先生好像有了這個認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這種同情和這個認識是附帶了條件的，這就是紡車固是人類利用他的腦和手所造成的，電力也是人類利用他的腦和手所發明的。發明電力的人，無疑的能夠造作紡車，造作紡車的人的腦和手也無疑的能夠發明電力或是能夠學曉和利用電力，雖則這些電力不必是由他發明的。這就是說，人類的腦和手是沒有什麼差異的，非然者，西洋爲什麼能夠從紡車的文化而產生出電力的文化呢？而所謂紡車上產生不出電力，不外是說，在紡車的社會裡的人們是心滿意足於紡車的文化，而不想他求；或是說，紡車的社會裡的紡車文化，是受了這個社會裡的文化其他方面所限制而不能有所變更。

換言之，紡車上所以產生不出電力，是受了這個社會的文化的限制，這就是所謂文化的文化基礎。然而這個基礎之所以能夠維持其狀態而不變者，也是有了條件的，這就是沒有外來的電力的文化和她接觸。假使有了電力的文化來和她接觸，那麼；她總不免會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受了影響，其結果是必至於不用電力而不止。這個結果的遲速，常常和其固有的文化的崩潰的遲速爲正比例。因此之故，我們固可以承認張馨先生所說的凝定了的舊文化對社會有其惰性的反作用，和我們的見解有了多少相近。可是他接着說道，「而沒有基礎的新文化對社會只有相當的影響而已」太過糊塗。因爲這裡所謂沒有基礎的新文化這句話的本身，就已不通。須知新的文化若沒有其基礎，她怎能成新的文化呢？新的文化之所以成爲新的文化，就是因爲她的本身上有了基礎。若說新的文化移植到舊的文化的社會裡而和舊的文化的基礎不相溶洽，所以說牠沒有基礎，那麼；我們的要務就要快快的把這個舊的基礎打破得乾乾淨淨，以免對於新的文化的接受有所阻礙。我們之所以主張絕對的打倒頑固的復古派和折衷派所戀戀於一部分的舊文化，就是這個原故。

說到這裡張先生也許舉例駁道：

園丁把最愛的幾種花移植在自己的園地裡了……但是不料過了一星期花瓣萎黃了，再過幾天，枝莖憔悴了，乾枯了，他們倆（園丁夫妻）研究實驗好久才知道不易生長的原因，是土性不合。自己的園地是沙礫土，而那個花原是在壤土裡滋長的。（中國文化之死路）

張先生這裡好像是指着地理的基礎而說，他在「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一文裡也有這幾句話：

當時意大利因地理上的優越，自由都市特別發達，自然做了商業資本的中心。

這也好像是承認文化的地理的基礎，這個認識本來是我們主張文化基礎爲多元而反對所謂專以經濟爲文化的唯一的基礎的人的理論根據。張先生這種認識，根本又是打倒他自己專以經濟爲文化的唯一的基礎的立場，這又是張先生的矛盾處。

我們承認文化的地理基礎，然而這種承認又不像張先生的不條件的承認。原來地理

（氣候，地形，土質，河流，等等。）之於文化，在消極方面固有很大的作用，（比方沒有河流海岸的社會的地方，用不着船舶；所以船舶的文化不能發生。）然在積極方面的影響，在文化愈高的社會，則其影響的程度必愈微。何況中國的地理環境之於歐洲美洲的地理環境，並沒有特殊的分別。要是一個四百五十年前沒有歐人踪跡的美洲，能在今日成爲歐洲文化的精華的代表，中國的地理環境難道就不適宜於這個文化嗎？

不但這樣，我們還且相信文化是築在生物的基礎上。所謂人種的優劣的論調，在二十年前每誤認做文化的生物的基礎，然而經過近代的人類學者的精確的研究，這種論調再也沒有人去相信。然而正因人的本身是生物之一同時他所依賴以爲生存者也是生物——動物植物所以可以說人類的文化就築在生物的基礎。但是這個基礎正像地理的基礎，在文化進步的社會裡，其影響於文化者微乎其微而有其限度的。

最後，我們又相信文化是築在心理的基礎。雖則現代的心理學家們對於人類心理的影響於文化的意見沒有根本上的雷同，張先生好像見到這種影響，他在「爲中國文化問題再

進一解」和在「中國復興教育運動宣言」裡均曾提及，在後一篇文裡且肯定的說：

一個民族的生存，必有其民族的靈魂以爲精神上的團結——此所謂民族的靈魂，即民族意識……………

在他去年所著的「娛樂教育」裡說：

歐美人自覺的，中國人糊塗的。

我以爲張先生這裡所謂的民族意識，和中國人糊塗的，本來是把他以文化的唯一的基礎是經濟的主張踢了一腳，打了一拳，而承認我們所主張的文化基礎的多元論。可是張先生對於心理基礎的認識的幼稚和錯誤，還不止此，我們以爲這裡所主張的民族意識，和他所說的中國人糊塗的底心理現象，無疑的是所謂固有的文化所形成的心理現象。換言之，就是後天的。但是這種意識和糊塗既是文化所形成的，那麼，要想自覺而不再糊塗，要想發起足以適應於現代生存之下的民族意識，不但這種糊塗和舊的民族意識也要立刻打倒，就是形成這種意識和這個糊塗的習慣的文化也要立刻打倒了。

設使張先生而以這種民族意識和糊塗根性是先天的，沒有法子改變的，那麼，長此以往糊塗以終無意無識，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呢？同時張先生所提倡的要從經濟上着手又有什麼用處呢？

我們承認文化的心理的基礎，然而這種承認也非沒有條件的，這就是說心理的要素是後天的，由文化所形成的，那麼，像我們上面所說要改進文化就要打倒這個舊文化，改變這種舊心理。若說心理的要素是先天的，那麼，我們否認西洋人的心理要素，像理性智慧……等，是優過中國人；換言之，我們承認人類的心靈是同樣的同等的，雖則各個人之間有了程度上的差異，東西洋人的先天心理的要素，既沒有分別，心理要素之所以為文化的基礎，而影響於文化的勢力也是很微的。

總而言之，所謂文化的地理，生物，心理，文化，等基礎，對於某種文化的形成和影響，雖有了密切而不可忽視的關係，然而這種勢力是有限度的。在某種時代和環境之下，他們或是無論他們之中那一種或二種三種，也許有了很大的勢力，而對於這個時代或是這

個環境之下的文化，影響很爲利害；可是時代一變，環境一變，他們即失了過去所有的效力。

至於專以道德或宗教或政治或經濟來解釋文化，只能算做一種觀點——偏狹的觀點，嚴格來說，不能算做文化的基礎。其原因是因爲所謂道德，宗教，政治，經濟，以至藝術，教育，各方面的本身，就是文化的各方面。因爲這些東西，無論那一種都不過是文化的各方面或一方面；所以反乎張先生以及一般的人們所說經濟是文化的唯一的基礎。我們說：

文化是經濟的一種基礎。

而所謂一種，也並不是像一般人或一些人說以爲經濟的文化基礎以外，還有所謂經濟的道德，或是宗教，或是政治基礎，而却是心理，生物，和地理，的基礎——雖則文化本身也可以說是築在文化心理，生物，地理，各種基礎之上。

這個關於文化基礎的問題的結論，我在他處已經說過，就是經濟史觀的鼻祖的馬克斯

與恩格斯，也沒有否認。現在一般否認的人，若不是誤會了這個學說的原委，必定是陷於不能自圓其說的地位。

上面是說明文化基礎，現在且來談談基礎文化：

我相信在現代化的世界裡，中國還沒有達到基礎文化的地位，雖則她早已趨向着這條路上跑；可惜四百年來我們跑得太慢，但是我們之所以跑得太慢的原因，又不外是固有而不適宜於現代世界的舊文化的基礎還未破除，而成爲阻止或障礙了我們西化的勢力。比方我們以爲我們的曆法是好過西洋人的曆法，所以不但十數年前通令採納西曆時有人反對，就是在二百餘年以前我們沒有法子去推算日食的準確的時候，也有舉國反對用西洋人來代我們弄好，而一般像楊光先之流，還大來提倡，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我們以爲我們的帆船好過汽船，所以有人說道：

火輪船者至拙之船也；洋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爲能，械以巧便爲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礮須人運而重不可舉；若敢決之士，奄血臨之，失其所恃，

束手待斃而已。（王壬秋陳夷務疏）

我們以爲我們的手車和騾車是勝過火車，所以我們的官僚人民，五十年前，寧願把數十萬元的金錢去購買在中國的第一條和唯一的淞滬鐵路，以便專把她來拆毀，最近來更有人相信大刀是好過飛機，所以大聲疾呼來提倡大刀救國。

有形模有功效的西洋的所謂物質文化之勝於我們，我們還是加以否認，加以反對。怪不得我們看不見西洋人的所謂精神文化的優越，死守這種的文化的基礎之上的中國人，而侈談打倒帝國主義，毋亦徒爲引帝國主義之侵略之厲階也。

我們的意見是：這個僅可以在閉關時代苟延殘喘的文化基礎，是絲毫值不得留戀的。何況她却正是處在現代世界基礎文化之下的窒礙物呢？所謂基礎文化，不外是一種可應付而適宜於某一種時代或某一環境裡的文化。現在稍有理性的人，沒有否認中國要現代化。因爲不現代化，却不能適應於這個時境之下，然而所謂現代化的根本幹體，就是近代西洋文化。西洋文化既是現代化的根本和幹體，西洋文化，也可以說是現代的基礎文化。這個

基礎文化，在西洋嚴格的說雖是完成於十八世紀的上半葉和十九世紀之間，然她之成立却可說是三四百年前。我嘗說：

假使滿清能於入關之後，循着明末的趨勢，盡量去採納西洋文化，澈底的加以創造與發展，則今日二十世紀的中國，實不難與歐美齊驅並駕，且或比之歐美爲優勝。

無奈七十年前的人們，既想不到西洋之可法，而七十年來的採納西化，又不外是採納西貨。同時，舊的文化基礎，既是死守而不願完全拆毀。適應於我們的時代環境的基礎文化之去完成的途程，還是很遠。

我們以爲現代化之所以爲現代化，雖經過三四百年以上的時間，但是創之者難，效之者易，我們苟能虛心誠意來西洋化，則三十年內也可以達到西洋人所達到的地位。然而要想達到這個地位，首先的條件，是不要像抱拂腳一樣的抱着所謂固有的文化，是要毅然決然的從根到底把那些陳腐不適用的文化基礎掃除得乾乾淨淨。否則，適應這個時代這個環境的基礎文化，終不能望其能根深蒂固的成立於這個若生若死的國家裡。



(三) 全盤西化與皮毛西化

一般最沒有意識而誤會我們最大的人，是把全盤西化來當做皮毛西化的了。全盤西化是澈底西化，而爲醫治皮毛西化的良劑。我們見得七十年來一般人之所謂西化，完全是片面的皮毛的。所以提倡全盤的，和澈底的西化，使中國能夠整個的西化；這是我們的本意。我們老實不明白責備我們主張全盤西化的人，爲什麼全盤與皮毛兩個名詞也弄得不清楚？要是這兩個名詞尙不明白，他們那裡配得來談西化？

所謂全盤西化，在消極方面，是像我上面所說，對於中國的固有的文化不要絲毫的留戀；在積極方面，是要澈底的西化。七十年來中國的西化運動的能效微而進步慢，無非是由於沒有全盤澈底西化。這是稍能涉獵近代西化史的人所容易明白的。鴉片戰後國人雖感覺到西洋文化的利害處，然自一八四八到一八六三的十餘年間，清廷盡全國之力來應付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之蕩平，雖也假力于西洋，然西化運動的實際工作，曾國藩總算是一個開辦者。曾國藩逝世之後，提倡西化最力者要算李鴻章。然而曾李所提倡的西化，不外是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

西洋的機器文化，這種機器文化之應當提倡，在現在看起來，三尺之童也能明白。然而在甲午以前的國人視之，無不大聲疾呼，以爲華夏效夷，乃置中國於禽獸之邦。曾國藩李鴻章當時之受人唾罵非難，而心灰志頹，洩於言表。思想最爲澈底的容闈，鬱鬱終其生而不得志，喜談洋務與明曉外國情形較多的郭嵩燾嘗嘆道：

竊謂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辦洋務三十年，彊史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之而獎飭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雍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鴉張無識之氣，鼓勵游民，以求一逞，又從而引導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鴉張無識者爲之也。

這不過是提倡中國應採納西洋的機器文化的人的不滿於當時的慨言。機器文化的採納，本來是皮毛西化，然而這個皮毛的西化之採納，在三十五年前除了曾李薛郭以及數位所謂通曉洋務的人外，舉國病之如洪水，中國西化之難，難於上青天。

三十餘年來國人一而再，再而三而四而五，……深受鉅創，於是甲午以至歐戰的「中

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論調充溢耳鼓；歐戰以後，國人又發出「採取人家的物質文化，而保存固有的精神文化」的調調；五四運動以後，思想雖稍爲變更，然究不澈底，這一點我們當於下面再說。

總而言之，七十年來的西化運動，全完是皮毛的。原因是由於提倡的人對於中國文化的病症和對於西洋文化的優越，未能洞悉；結果是所謂西洋文化，是機器文化，是功用文化，是物質文化；以至五四運動時所說的，是科學文化，是民治文化，均不過是片面的見解。所謂時代的先知與思想的先進的東西文化觀，都不過如此，一般醉夢於陳腐之途的人，可想而知。

理論上的西洋文化觀，既是不澈底，實際上的西化運動，怎能希望其澈底？這何異緣木求魚的故智！我們感覺到這種不澈底的思想所產生出的弊病和危險，然後主張全盤西化，目的在乎改正過去一般的皮毛西化的思想，同時希望像我在上面所說，在稍極方面，掃除固有而不適時境的文化；在積極方面，努力於澈底西化之途。然則全盤西化之與皮毛西

化之分別，於此可以明矣。

(四)全盤西化與接受西貨

還有一般最沒有意識而誤會我們最大的人，是把西化當做西貨的人。在「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一文，我很明白的說：

我雖極力主張全盤和澈底的西化，却不主張盲目的全盤和澈底的接受西貨。

張磬先生讀了我這段話，很無意識的駁我道：

這裡除西化之外，又跳出一個「西貨」甚麼，我雖是極力主張全盤和澈底的西化——這裡不說接受了，確有意思，作者註——却不主張盲目的全盤和澈底接受西貨，以移嫁籠統的盲目西化運動的責任，倒運的西貨，代人受過。

我很可惜我少出窮鄉，幼流皇朝士人所目爲蠻荒之地，此後寄身歐美，以至於今，還沒有受過林幽默大師所謂文字國的咬文嚼字的洗禮，所以引起大清皇帝乾隆陛下先生所謂人文之藪裡的文字省裡的代表的張先生的誤會，而且加以補註，然而正是因爲張先生只長

於咬文嚼字，結果是把我的意想完全錯解。

梁錫輝君所筆述那篇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詞的大綱，有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詞句，而在我個人的著作也有這種的詞句，可是凡讀過我的演詞或是著作的人，決不會像張先生那樣沒有理性沒有頭腦而生出這個誤會。我上面已經說過，全盤西化是糾正皮毛西化的弊病與危險。所以主張接受全盤西化（或是西洋文化）的人，決不會只要中國人去購買西洋文化，而成爲張先生所說的，「這確是西洋文化的絕好廣告。」我在「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詞裡劈頭就說：

兄弟是特別主張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國文化澈底的西化。

正這是我所說我雖極力主張全盤和澈底的西化，却不是盲目的全盤和澈底的接受西貨。我又說：

現在世界的趨勢，既不容許我們復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許我們應用折衷調和的辦法，今後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向澈底西化的途徑。

又如：

無論積極方面或消極方面，都可以証明中國文化的出路，是要去澈底的西化。

再如：

最後歸結到中國文化的出路，無疑的要從澈底全盤西化着手。

我的解釋到這麼明白，張先生苟非故意的倒是爲非，必定是中了張先生自己所說的中國人糊塗的劣性而至讀書全不求解的弊病。

何況在我所摘錄六年前所著的「再開張的孔家店」一文，曾有「我們若只歡喜住洋樓，而不求做洋樓的材料和方法」一類語而所謂求做洋樓的材料和方法，就是努力全盤西化，不是接受全盤西貨。又何況「西化」和「西貨」這兩個名詞的分別，在我三年前在社會學刊二卷三期所發表的「東西文化觀」一文裡，已經清清楚楚的指出，我且抄出一段於下：（參看最近商務書館所出版拙著「中國文化的出路」頁六〇）

我們以爲設使中國真西洋化了，中國老早赶上歐美，至少赶上日本，無奈孫（本文）

先生所說的大部分，乃是我們所享受的西洋的貨，並非我們自己所創造的西洋文化。我們自己不會做汽車，只會坐汽車，這樣叫做西洋化嗎？無怪得數十年來的提倡西化，終不見得化得什麼？

張先生以爲除西化之外，又跳出一個「西貨甚麼」，是真的跳出來的，那知他跳來跳去，畢竟跳不出我的袋子。

（五）全盤西化與籠統西化

一般非難我們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以爲我們所主張的全盤西化，太過籠統，比方張聲先生在「中國文化之死路」一文裡說：

我本來決不是絕對反對西洋文化的人，更不是所謂些復古派，折衷派；不過像他們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而不言手段只標目標的籠統的宣傳，必至一般青年們盲目的崇拜西化，以至穿西裝是西化，吃西餐是西化，……甚至一香水，一糖果，非舶來品不足以表其西化，——不西化便落伍，……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

博士說，西洋文化……是現在世界的趨勢。但是說到趨勢也並不簡單，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既因發生內在矛盾，造成屢度的繼長增高的經濟恐慌潮，碰了壁自然得轉灣，向左轉，變成社會主義國家，而有社會主義文化，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向右轉，變成法西斯國家，而有法西斯文化，也就是小資產階級文化（？）所以在西洋文化的花園裡，有滿面啼痕的白杜鵑，有如火如荼的紅芍藥，有卓然聳立的黑牡丹，有雄心勃發的褐芙蓉，五光十色，斑駁陸離，青年們一入園門，必至目眩心迷，應接不暇。全盤接受，無異吞了矛盾的炸彈。年來中國文化界的混沌，矛盾，衝突，紊亂，就是如此；這裡頭包含的大危險，大概博士也承認吧。

所以貿然用「全盤」二字，要負責任的，我們應該忠實地負青年的指導責任，籠統的暗示是使不得的。

原來所謂全盤西化，就是籠統的西化的意想不過就是這樣！關於所謂籠統的全盤西化而至皮毛西化接受西貨的誤會，上面已經解釋清楚，不必多說。至於誤會全盤西化爲籠統

西化，我們不妨在這裡畧爲說明：

我以爲這個誤會是誤會中之最沒有意識的了。原來西洋文化是一件事實，是一件有形態，有體質，有眼睛皆可以見，有知覺皆可以感，有耳孔皆可以聽，的東西。並不像張先生所醉心的第三手貨見解的經濟史觀，而專只提倡的須從經濟入手的學說那樣籠統，因為這個學說還是學說，還是空中樓閣，還是海上浮雲，——質言之，這個學說還不過是西洋人對於西洋文化的一觀點，一種預知罷！

把事實來當做籠統，把事實尙未證明的學說來當做不籠統，世間人之顛倒是非之若此之甚者，孰有過於張先生呢？有樣可法的西洋化的努力主張而是籠統，那麼，夢想的馬克思的冒徒的主張，豈不是成爲籠統中的籠統；而最籠統的嗎？效法人家已施諸事實的東西，而謂籠統，效法人家的夢想而不覺其籠統，張先生所謂糊塗的中國人，其是之謂也！

張先生在「娛樂教育」一文，豈不是說過嗎？

中國貧在物質，歐美病在過重物質；歐美自覺的，中國人糊塗的；所以他們對於哲

學趨之若鶩，無怪其然，決不可以執之以繩中國。歐美基礎教育已完成，當然可以努力於推廣大學教育。

張先生這段話可以非議之處很多，比方在時間上歐美人的大學教育的逐漸推廣，是和歐美近代文化的逐漸發是相輔而來的，並非先立了基礎教育，然後推廣大學教育。至於哲學的產生與發達，更不待說。

可是張先生既明明白白知道西洋的基礎文化，——教育在內——已經完成，故能多做點夢想——哲學？在內——爲什麼張先生還反對這個基礎文化而專取基礎文化之上的馬克斯主義？這麼一來，豈非更是籠統嗎？

張先生還有一個理由，以爲在西洋的文化花園裡，花樣雜出五光十色，青年人們見之，必至目眩心迷，應接不暇，故謂全盤西化爲籠統西化。我的回答是：青年們與張先生之所謂目眩心迷，正是因爲他們對於西化的認識太過淺薄，比方廣州的街道，固爲認識廣州者一目了然，隨心所欲，而東西往來。反之，一般沒有到城市的鄉下人，一到省城，免

不得要有迷途之困難。今鄉下人不知自己之沒有認識這根本可以聯通的大道，而徒然謾罵街路太多，有何益處？有何益處？

是的，西化花園裏有極左的主義，有極右的主義的。然而極左極右只是時代環境裏一種暫時變態，民主中心的制度，並不推翻。何況極左與極右也並非離開民治，民有，民享，的原理，而趨於己治，己有，己享，的悖理：他們——西洋人——有的有皇帝，有的有總統，然而他們的皇帝既未必像我們心目中的皇帝的權力大過總統，而他們的總統也不必像我們的總統還要一做皇帝。總統也好，皇帝也好，政治的權力總是在人民的手裏。他們有富人，他們有窮人；然而富的既不像我們的富人，左擁三妻，右抱四妾，專爲子孫而積錢財；窮的像我們窮到沒得食，沒得穿，沒得住，學校沒得受，娛樂沒得享。

總而言之，在西洋人的文化花園裏，雖是五光十色，班駁陸離，然他們却有其共同的基礎，共同的階段，共同的品色，共同的要點，這是凡到過歐美的人所能目見，而一般頭腦清楚的人所能從間接的書本上了解的。

假使張先生而不相信我的話，假使張先生而不能從書本上悟及這一點，我還是請張先生自己親身跑到歐美着實地細心考察，認真的努力研究，然後再來和我們談談，尚不覺其爲太遲呵！

（六）全盤西化與中國國情

又有些人以爲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所以全盤西化未必能適宜於中國的國情。我們以爲這一些人的錯誤，是對於國情這兩個字的意義沒有充分的了解。什麼是國情？我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三號曾發表過一篇「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裏面有了下面一段語：

國情這兩個字，雖然可以包括一切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人種——以及文化的情況，然而事實上所指明的根本却只能說是文化方面，我們承認天然，氣候，地理上的不同，固然可以影響到教育的制度，然在文化進步的社會，這些東西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而且事實上中國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和西洋文化先進的各國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此外若說中國人種的聰明和腦力沒有像西洋人這麼高超，

所以說不到來模仿新教育，配不上來享受新教育，這是無論何人都會不承認的。

我又說：

所謂沒有經過現代化的中國，不外是舊的中國；舊的中國是舊時代的產兒，從新的時代或現代看去，舊的中國若不是落後的中國，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國，因為她若不是落後或古董的中國，他必定是適合現代的中國，適合現代的中國，就是新的中國。要是整個中國是新的，是現代化了，那麼，教育也必定是現代化了，也是新的，同時這一個中國是用不着現代化的。而這一種教育也用不着新化，更沒有所謂中國化（合於國情）的可能，所以要使新教育中國化，其結果若不是新教育的退後化，至少也有新教育的古董化的危險。

教育不外是文化的很多部分當中的一部分，教育固是如此，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這樣看起來，以全盤西化之於中國國情未必能夠適宜的言論，又是無稽之談了。

（七）全盤西化與民族意識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

關於這一點，我在文化基礎與基礎文化一段已經畧爲說明，並指出張謇先生對於這點
的錯誤，此外謝扶雅先生在「爲中國文化問題進一解」一文裏，也有這樣的話：

然而我們在談文化或民族性問題底時候，決不當因爲中國文化有缺陷底緣故，隨而輕蔑中國文化，甚至連帶着不起中國民族，却反應當格外尊敬我們自己的民族，愛護自己的民族，而對於我民族抱堅決的自信心。……自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中國常常妄自尊大，視西洋爲四夷。鴉片戰爭以後，漸由排外一變而爲畏外，更由畏外一變而爲媚外。媚外的程度日甚一日，自蔑的程度亦日甚一日，其結果是：無論什麼事凡西洋的統統是好的，凡中國的統統是不好的。九一八以後，河山破碎，國命垂危，照理定會看到明耻勵戰，愛國心蓬勃瀾漫的現象，反不料喪神落魄，自暴自棄的狀態，更有急轉直下之勢。民族自信力壓根兒淪喪無餘大定心裡都隱然覺得中國民族實在沒有辦法了，有人居然說這個民族太老了，血質已竄敗了，自然更有人主張中國文化整個地要不得，非全盤換過不可，於是順理成章的，自然會有人起來

主張中國非把西洋的一切文化統統模仿過來，除此以外更無第二條出路。

謝先生這篇文章是讀過我在中山大學的演講詞以後寫的，他一方面偏於經濟決定論，一方面又承認民族意識論。本來像我上面對於張謇先生關於這點的批評難圓其說，似用不着再來解釋，可是他這段話裡面有了幾點是一般人所很同情，而事實上却有不少的錯誤，所以我很願意把我意見來說一下：

我在社會學刊二卷三期的「東西文化觀」一文裡，曾有一段話是對於這一點畧加說明，後來（二十一年冬）我把這個題目寫成一本書，除了裡面第十三章的「人的文化與物的文化」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九號發表外，其他部分尙未發表，然第二十一章裡有下面數段話，對於這點加以解釋，今且摘錄於下：

有些反對全盤的人，以爲每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化，所以文化成爲民族的靈魂，或是生命所在。文化若是拋棄，則民族也必隨之而亡，這種見解的錯誤，在於不明瞭文化是人類適應時代環境以滿足其生活努力的工具和結果。文化既是人類的創造品

，不外是人類的工具，人類的靈魂精神固可以從文化中見之，然而她的真諦並非保存文化，而在於創造和改變文化。

我又指出我們五千年前的祖宗，曾做過茹毛飲血的生活，然而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卻放棄茹毛飲血而做熟食的生活，再過了多少的時間，我們的祖宗且會調味觴飲，可知某種文化生活可以放棄改變，然而這種放棄改變，民族並不因此而淪亡。

我又說：

反對全盤西化的人，以為全盤去採納人家的東西，是蔑視輕鄙我們自己的文化，而為一種自暴自棄的奴性，我們以為我們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別，既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種類的各異，則我們之全盤採納西洋文化，不過是做進一級的文化生活，安能叫做蔑視輕鄙自己的文化？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說明，從文化的各方面看去，我們的確樣樣都不如人，知道樣樣不如人，不外是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能夠明白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纔有改良缺點糾正錯誤的努力。有了改良缺點和糾正錯誤的

努力，纔有進步的可能。可知全盤西化，並非鄙視自己的文化，世間只有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而求改良與糾正的人纔算好漢。……………

進一步來說，所謂全盤西化正所以重視我們的文化，……………設使我們而能自己趕緊全盤西化，再從而發展之，擴大之，則不但我們自己佔有世界文化的優越地位，就是我們祖宗在歷史上所做過的成就和所得到的光榮，也賴我們而益彰。則今日外人之所以因鄙視我們的文化而鄙視我們的祖宗的文化，也能因為他日重視我們在世界文化所佔的重要位置而重視及我們的祖宗與其文化。

我又說：

至說因為全盤西化而成爲自暴自棄，那更是無稽之談，能夠全盤西化，怎能叫做自暴自棄呢？只有享受祖宗所遺下的文化而不想再有振作的人，乃是自暴自棄的人。反之，能夠努力去全盤西化，纔算能幹纔算有爲。原來全盤西化，並非一件反掌就得到的事，人家費盡無數的腦血時間，始達到今日的地位，我們想在短促時期裡達到

同樣的地位已是不易，何況這些東西樣樣都比較爲複雜，較爲深奧，則其所需的精神腦血當必更多。試問這種工作是不是庸庸碌碌的自暴至棄的人所能擔任所能做到呢？

謝先生好像又以爲全盤西化之於畏外與媚外有了多少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我的意見恰恰和謝先生處於相反的地位，要是我們撇開理論而專講事實，歷史上無意識的鄙外與排外最利害的固是反對西化最力的人，然而歷史上最爲下賤的畏外與媚外最利害的人，也是反對西化最力的人。大家大約總能承認，從來華南民衆之努力西化，比之華北的民衆熱心得多，然而根本上正是爲着這個原，故華北民衆之畏外媚外特別利害。八國聯軍之入京，差不多整個城內的民衆，很不知耻而自動自貼了本家是順民的字樣。這次東三省之淪亡，熱河長城一帶之失陷，華北民衆的畏外媚外性當然有了不少的作用。反之，華南民衆因爲習染西化較深，所以從林則徐之抗英，經過劉永福馮子材之抗法，以至十九路軍之抗日，彰彰可考。然這還不過是舉其重要者，其他之足以說明努力西化者之不畏外不媚外而躊躇

西化者之畏外與嫌者不可勝說。

謝先生又指出九一八以後的中國民族的愈不可爲，從一方面看起來，我表同情於謝先生。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起來，他好像和我有了根本的差異。我的意見是與其說中國民族之所以至此，是由於西化，不如說是由於沒有全盤澈底的西化。我記得當張之江先生南來提倡大刀殺敵並大印其驚人的宣言，我曾寫了一篇很短的感想，裏面有了下面兩段話：

我想二十五年前的滿清，雖不知西洋文化究竟是什麼，還能覺到應當效法西洋憲法。三十五年前的張之洞，雖不知西洋文化究竟是什麼，還能覺到西學西藝的必要。四十五年前的李鴻章，與六十五年前的曾國藩，雖不知西洋文化究竟是什麼，還能覺到西洋兵器的必要。今乃每況愈下，爲黨國要人而又自鳴爲信仰泰西的基督教的張之江先生，還要提倡用大刀殺敵，這簡直是令我們百想而不得其解的。

不但這樣，中國之所以弄到這個地步，原因是由於頑固成性不願西化，結果是要被人迫而始化。所以過去的西化運動，每每澎湃於國家患難之秋；換句來說，就是多

受一次的巨創，國人始感覺到要做進一步的西化。像曾國藩之採納機器，是在英法聯軍和後太平天國亂後的反響，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以至張之洞劉坤一的變法，是甲午敗後的反響。而滿清的預備立憲，是義和團事件後的反響。這次國難當頭，土地喪失，為百年以來所未有的奇辱，平情來說，國人應當格外痛定思痛，努力打破過去的頑固不靈，死守成規而徒作毛皮形式的西化，立志決心去做全盤澈底的西化。誰料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極端的開倒車的運動，滾滾而來，這豈非中國速亡之兆乎？

總而言之，我們既不承認西洋的民族意識是先天的，而是文化所形成的；那麼，中國民族意識之所以沒有發展，也非先天的，而是中國固有文化所形成的。想有足以生存於現代世界的民族意識，消極方面，就要放棄過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頹廢不振的民族意識；積極方面，就要全盤澈底去西化。能夠全盤澈底的西化，就是激動起一種新的民族意識而適宜於現代的世界。

相信中國可以全盤澈底的西化的民族，是有自信心最強的民族。因為相信中國可以全盤澈底西化的民族，是相信西洋民族所能創造的文化，中國人也能創造。只有相信中國民族有了這種創造的能力的人，始能自信中國將來的文化不但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且可以超越在歐美所成就之上。全盤西化有損於民族自信心之謬說，可以不攻而自破矣。

（八）全盤西化與五四運動

在中國文化之死路一文裏，張馨先生這樣的告訴我們道：

中國的五四運動，早已做了陳博士所宣傳的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資本文化的試驗事業。

而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我一文裏，他又說：

中國的西洋文化運動，原不是自陳博士始，五四時代的資本主義文化運動，敲醒了全國思想界的夢，誰不異口同聲地力主全盤西化，果然浩浩蕩蕩，頗一時之盛，所謂塞恩斯與德說克拉西——這大概是被指為所謂精神文化的東西——的高潮瀾漫了

全國，懿歟盛哉。

中國的西洋文化運動之不自我始，是小學裏的學生也會知道，用不着張先生來提醒一般的讀者。可是很奇怪的，張先生又好像以爲這個西洋文化運動是始自五四時代；而其實呢，這個運動，近而言之，至少有了七十年的歷史，遠而言之，則明末清初已經有人提倡了。

然而最奇怪，而爲我的淺識所認不到者，是他說全盤西化的主張，在五四以後全國思想界已異口同聲的浩浩蕩蕩的提倡了。張先生在「中國文化之死路」一文裏，以爲我們貿然用「全盤」二字，是要負責任的。要是全盤西化的主張是要負中國文化的死路的責任，我們又何敢推辭？張先生現在又說五四以後國人對於全盤西化已極力提倡，這豈不是爲了我們移嫁全盤西化主張的責任嗎？照理我們應當感謝張先生，張先生是多麼善於變卦的人呵！要我們負責然用「全盤」二字的責任，是張先生，爲我們移嫁全盤西化的責任也是張先生。可惜我未必是一位移嫁責任於人的人。

我對於五四運動時代以及此後的著作方面的了解，也許沒有像張先生那樣深刻，可是也頗自信做過多少研究的工夫。在一般的國人的著作裏，除了主張「復古」的梁漱溟先生用過「全盤」兩個字外，既不容易找出全盤西化的字樣。在所謂思想領袖的陳仲甫和胡適之先生的著作裏，好像也找不出全盤西化的話類。其實不但這個名詞不容易找出來，就是這種思想他們也是沒有的，陳仲甫先生在新青年六卷一號本誌罪案之答辯書裏說：

大家平心細思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

這是主張全要西化的人的口氣嗎？「全盤」二字在那裏？全盤的思想又在那裏？

仲甫先生後來見得人們反對基督教很利害，又做了一篇文爲基督教辯護，可是他後來的思想大起變化，連了他過去所主張的部分西化也根本的懷疑起來，於是可見得他不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人。

至於胡適之先生在胡適文選裏「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裏，雖有中國百事不如西洋人

的語氣，可是在他的著作裏，我好像找不出「全盤」二字。

其實適之先生是相信東方（中國的）的哲學，和西方的哲學接觸以後，會產生一種東西合璧的哲學。他又相信科學精神，在中國的宋代，已經有了。而科學的成績，在清代的學問裏已經斐然可觀。這和他以為西洋的文化是科學的文化有了抵觸，所以若說胡先生是提倡全盤西化的人，也許胡先生不承認。

我們正是見得所謂五四運動的領袖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上，尙欠深刻和澈底，而生出東西合璧以至皮毛西化的結果，所以「貿然」主張全盤西化。張先生沒有明白這一層，結果不但誤會以為我們所謂全盤西化，乃皮毛西化，採納西貨，還且誤會以為五四運動早已做了我們宣傳的全盤西化的試驗事業，這豈不是一種冤枉嗎？

我自然感覺到五四運動時代的中國思想界之認識西洋文化和西化主張之影響於國人，比較中國的過去的西化運動較為普遍，然我不覺得她是一個全盤而澈底的西化運動。這一點說起來話是很長的。但是中山大學的「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詞已很明白的說出來，難

道張先生總看不見嗎？

(九) 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

張馨先生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我一文裡說：

……下面又提出了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採取人家的物質文化應當採取人家的精神文化，等語……據我看來，這種話原是極陳腐的見解，似乎抄襲了胡適博士的老調，但却取了他的短處，遺了他的長處。

他又說：

事實勝於雄辯，我的立論就建築在這些事實上面，恰恰與博士的主張相反，就是：精神文化的演化，隨着物質文化的演化，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精神文化是物質文化的表現。

我在「中國文化之出路」講演詞裏，曾把七種折衷主張來批評，並指摘其錯誤。所謂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不過是被我所批評與指摘中之一種。所以張先生所目為極陳腐的見

解，我不但早已見得到，而且進一步來批評其錯誤。張先生沾沾自喜而以此來駁我，豈非可笑？

至於他以爲所謂精神文化是物質文化的表現，這句話是他自己的話，而和所謂物質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現是我的話，而成爲他和我的恰恰相反的要點。「我閱了之後，的要笑痛了我的肚子。」——這句話是借用張先生的，作者註。我在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詞裏，老早說過：

物質和精神這種思想，是以爲中國的文化是精神文化，西洋的文化是物質的文化。主張這種思想的人，以爲西洋的物質固有可取，但其精神文化則不及我們中國。所以我們一方面要保存我們的精神文化，他方面要採納西洋的物質文化。這種折衷辦法可算是普通——雖則我不用陳腐的刻薄話，作者註——的折衷辦法，我們對這種見解的批評是以爲所謂物質和精神的文化的文化，不外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物質文化所表現之處，便是精神文化所寄存之處，觀察其精神文化，同時也可懂得

其物質的文化。她們的關係，正如一個人的肉體和他的靈魂的關係，兩者處處都是互相爲用而不可以分開的。縱能分開，也不能使我國的非物質的精神生活，和西洋的物質文化相溶洽。

張先生讀書完全不求甚解，我的全部整個思想和主張，他因領會不到，所以斷章分句來非難我，殊不知他所拾以爲至寶而把來非難我的東西，我老早已經說過。上面所舉一段話，固是我在「中國文化之出路」演講詞裡所抄出來，然在社會學刊那篇「東西文化觀」一文，已有同樣的詞句，就是六年前所草的，而在「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謇先生」一文裏所摘錄「再開張的孔家店」一文那段話，也有這樣的一段：

良以把文化來分做物質，精神，二方面，乃我們爲了利便研究起見而發生的主觀的觀念，並非文化本身上有物質，精神，之分。因爲物質與精神文化是不能分開的。凡是相信物質與精神文化是不能分開的人，都免不得相信像我在「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詞所說：

物質所表現之處便是精神所寄存之處。

同時也不能否認我在同處所說：

觀察其精神文化，同時也可以懂得其物質的文化。

總而言之，我在演講詞裏老早已說過張先生所拾以爲至寶而把來非難我的那句話。我在演講詞裏且先說，「物質文化所表現之處，便是精神文化所寄存之處，」然後纔說，「觀察其精神文化，同時也可以懂得其物質文化。」一先一後，固未必表示所謂物質文化是要過精神文化；然也決沒有表示精神文化是重要過物質文化。張先生既沒有眼睛見到這點，而又忘記了主張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不能分開的必然結論。不但是，

物質的文化是精神的文化表現，

而且是，

精神的文化是物質的文化表現。

這樣沒有眼睛而又沒有悟性的人，其不弄巧成拙者，蓋亦鮮矣！其實這樣沒有眼睛而

又沒有悟性的人，怎能配得來談這麼一個題目呢？

我所摘錄「再開張的孔家店」一文那段話，所以不說出我在演講詞裏的物質文化所表現之處，便是精神文化所寄存之處的必然結論那兩句話的理由有二：一來這篇文是寫在六年前人們大事提倡中國的精神文化的時代，目的是告訴他們西洋不但有其物質文化，而且有其精神文化，而且科學既是精神文化，近代的物質文化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於科學發達而來。所以說物質文化的演化是隨着精神文化的演化。我接着說：

我們差不多可以說物質的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現。

我不說「肯定的」，「科學的」；而說「差不多」，「可以說」；就是因為我所主張精神與物質文化的不能分開的必然結論；和我老早已經說過的物質文化所表現之處，便是精神文化所寄存之處；是不能一筆抹殺的，不能否認的。

這樣看起來，我所說的「差不多」，「可以說」，這句話，比張先生所拾了人家的皮毛的什麼「肯定的」，「科學的」的口氣，而事實却不肯定却不科學，妥當得多了。

二來呢，我在「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馨先生」一文，所以抄出「再開張的孔家店」那段話，目的不過是像我所說：

這兩段話，至少可以說明我並非一個主張專事享受西洋貨的人。

張先生既沒有眼睛去看看我的演講詞，又沒有悟性去領會我的必然結論，現在又不明白我那兩段話的目的所在，而專事斷章分句來非難，而且大做其沒有意思的文章，這正是他所謂大放其機關槍——浪費了許多無謂的子彈。

我既相信文化的本身上沒有精神與物質之分，而從文化本身的觀點來解釋文化，我和受過杜威先生的影響最深而極力提倡科學的胡適之先生，當然有了相異之點。何況在全盤西化與五四運動一段裏，我已說明他對於東西文化的觀點，也和我有了不同？又何況所謂以文化來分為精神與物質兩方面來做東西文化合璧的論調，是我所根本不贊成而極有批評與指摘的？張先生以為提出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就是抄襲了胡先生的老調，是太沒有根據了。

何況這種所謂老調，也不是自胡適先生始。胡先生那篇「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是寫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可是在胡先生未寫這篇文章以前十年的歐戰發生以後，國人已有不少的大來提倡東方的精神文化與西方的物質文化。歐戰以後，梁任公一般人又見得歐人因戰爭而破壞其過去的物質的成就，於是又大來提倡東方的精神文化，所以胡先生纔的這篇文章。胡先生劈頭且明明白白的說：

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爲唯物文明，而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文明，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却有新興的氣象。………………

可知我所提出的所謂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並非胡先生的老調了。

其實我在演講詞裡於未批評和指摘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折衷辦法之前，已批評與指摘了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和道的文化和器的文化的折衷辦法。我且相信這幾種的折衷辦法是有關係的。曾國藩和李鴻章的代表人物的薛福成所提倡的東方的「道」可以和西方的「器」調和起來的言論的變相，就是東方以精神文化可以和西方的物質文化調和起來的言論

。所以要是這種的折衷或調和而是老調，她不但不是自胡先生始，不但不是自歐戰後就有了，追源窮本，她可以說是始於五十年前，六十年前，或是七十年前罷。

反之，張先生明明白白是「抄襲」了胡適之先生的「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基礎之上」來做他的護身符以非難我，雖則他却取了他的短處，遺了他的長處。

我們要一個新文化哲學

盧觀偉

我們要是小心讀讀我們自己近百年來的歷史，總會不至到認識不出這百年來歷史演進中的大趨向。在這個歷史演進的歷程中，雖然時常有不少的阻力和障礙，令到進步的路線不循着直線進行，東倒西側，時左時右，走得很遲滯，不能滿足我們的願望；但是經過許多人大大小的努力，才得到的進步，是不能抹煞的。那歷史的趨向和目標是很顯明，不容許我們絲毫懷疑的。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八九十年來，中國的歷史，可以說已進入于「文化的適應」

(Cultural Adjustment) 的歷程中，我們初由夢中驚醒，不知怎樣應付這個「大變局」，後來漸漸覺悟，非走「新」的路途不可，非「向西走」不可。這個「向西走」的方向和路程的採擇，本來不只是我們的辦法。一六九八年（恰好和我們戊戌百日新政的時候，相隔二百年）俄皇大彼得的「向西走」，和一八五三年美國水師提督培理率艦隊敲開當時鎖國主義的日本的門戶，使得日本也不得不「向西走」，這是過去也許將來，和我們的歷史曾發生或將發生許多糾紛和關係的，新近才算做現代式國家的，兩個東方和半東方的民族，相同的運命。

我所以舉出上面這幾件極顯明而又極顯淺的歷史的事實，因為牠太顯明和太顯淺的緣故，很容易會被人忽略或忘掉。于是我們打起筆墨官司之時，大前提的事實既弄不清楚，辯來辯去，也就不能得到甚麼滿意的結論或判斷。但是稍為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對於上面指出近代中國和東方歷史演進歷程中的大趨向，是不能不承認的。

敘述這種趨勢的名詞，三十年前中國的智識界，叫牠做「維新」，今日智識界的最普通的用語，是「現代化」或「近代化」。但是造成這「維新」，「新」，或「現代化」的世界的理想原

則和力量，至到現在，還是要承認歐西爲牠的本家或重心。所以有人喜歡用「歐化」或「西化」一語，也是同樣的意思。

但是我們所應該注重和無錯誤地認識的，倒是在於名詞所象徵的事實和牠應有的涵義。因爲凡屬一個名詞或一種理論，不過是要來敘述和滿意的解釋一種事實的。所以懷疑「現代化」，「西化」，或「全盤西化」的論者，先要認清楚「現代化」，和「全盤西化」這名詞裏面應具有的不可少的事實 (Essential Facts) 和涵義。就是先要明白人家對於「現代化」或「全盤西化」一語怎樣用法？所主張的理論是怎麼說法？

在這本小冊子裏所搜集近數月來在廣州發生的一場關於文化論戰的文字，是起於有些論者的不滿意於「全盤西化」論的太籠統。好像張謇先生在「中國文化之死路」（見廿三年一月廿五日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裏這樣說：

「我本來決不是絕對反對西洋文化的人，更不是所謂些復古派折衷派。不過，像他們主張全盤接收西洋文化，而不言手段，只目標的，籠統的宣傳，必至一般青年們盲目

的崇拜西化。以至：穿西裝是西化，吃西餐是西化，住洋樓是西化！不西化，便落伍。

「現代的西洋文化是甚麼呢？却始終沒有明明白白的告訴出來。這含糊的暗示，未免使青年們要『摸不着頭路』而有『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的危險。這個問題，在五卅運動時代，原是很簡單的：西洋文化，就是資本主義文化，也就是資產階級文化。所謂『塞恩斯』，『德謨克拉西』，原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產物。但是，現在要回答這個問題，決沒有那樣簡單了。

「所以在西洋文化的花園裡，有滿面啼痕的白杜鵑，有如火如荼的紅芍藥，有卓然聳立的黑牡丹，有雄心勃發的褐芙蓉，五光十色，斑駁陸離。青年們一入園門，必至目眩心迷，應接不暇。全盤接受，無異吞了矛盾的炸彈。年來中國文化界的混沌，矛盾，衝突，紊亂，就是如此。這裏頭包含的大危險，大概博士也承認吧？」

「所以，貿然用『全盤』二字，要負責任的，我們應該忠實地負責任的指導責任；籠統

的暗示，是使不得的。

「所以，不從中國經濟生產力方面力圖改造，而徒事高唱『全盤接受西洋文化』，是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是努力于自殺運動的工作。」

又如謝扶雅先生在『爲中國文化問題進一解』一文（見廿三年一月廿二日現代青年），也有下面的話：

「文化本是一個很大而很複雜的問題。我們總應在未加籠統讚美或籠統非難之前，加以長時的研究與批竅，而得充分的正確的了解……我們對於整塊的西洋文化，應先施以大規模的解剖與分析，審查與研討，而不必遽加讚美或遽唱全盤接收。」

關於張先生和謝先生所批評各點的答辯，已見于此冊中其他的論文，我現在不想複說。我現在只想說明，如果我們承認「現代化」是十九世紀以來的中國和東方最大的歷史的過程，而由此事實和過程產生指導新時代新環境的文化理論，或文化理想論（Cultural Idealism），三十年前，既可用「維新」等用語和主張，則今日更不可不用一更積極更澈底的

用語和理論，以指導今日仍有「盲人騎瞎馬」的危險的中國及東方應走的途徑。讀者如一讀如陳序經先生的近著「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應該可以看出，中國人對於「現代化」或「西化」的態度，被內外新環境的要求，每代確有每代的進步，今日如胡適之先生的「西化」態度，比較前人如梁啟超郭嵩燾的「西化」態度，澈底得多，積極得多，完滿得多。胡先生說：

「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佔了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這樣的「西化」論，乃張之洞的「勸學篇」裏頭所夢想不到的見解。當時張之洞的思想，我以為現在也要不可太快忘掉。我們要問問爲甚麼他的見解會那樣奇怪？他論民權有四害而無一利，中國宜有官權。他這樣說：

「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綱紀不行，大亂四起。」

我們今日還有自由來讀三民主義的人們，讀了這樣的話，真有「隔世之感」了；也不能不算得了一點進步。

但中國除了「西化」的思想有進步之外，整個「現代化」或「西化」事實上的進步，因為國民教育的不普遍，及其他種種的障礙，雖然到今也不能令我們滿意，但不能說絕無成績之可言。如張星烺近著「歐化東漸史」（商務印書館版）那本書裏頭，所列舉「有形歐化」（歐洲物質文明）的軍器，學術，財政，交通，教育等事業，「無形歐化」（歐洲思想文明）的宗教，倫理，政治，藝術，學術上各種思想等；確是不可埋沒的真實的成績。我們觀察歷史，要整個的去，有時會退回頭幾步，不循着直線進行，但仍然是進步的。有時有人歡喜開倒車，有時代落伍的危險，有時開車開得太快，有脫軌的危險；都是病在主觀的閉着眼睛的，只知自己所造成的幻想世界，誇大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不肯對付事實（To Face Facts），就是不肯認識和對付真實的環境和根本的需要。美國有一位學者說，這是一種心智的自殺（Mental suicide），是一種慢性的半睡半醒症（Chronic somnolence），在文化上表現是一種

文化的病態，由地理上或知識上隔離所致，我們不可不警醒，但看牠也不必太過神經過敏。因爲歷史不是循環的，這樣的文化病態，是一時的，是片斷的，終歸會被文化的健康所克服，人類只須減少過去的錯誤，好好地認定目標向前進，就必不會徒勞。

所以在現代和現在的中國，我們要造成一個新文化哲學，以應付我們目前的新環境和新事實；我的意見倒以爲那些不滿意于「全盤西化」這個名辭和理論的人們是看錯了。因爲我以爲從歷史演進的歷程來看，非這樣地說，這樣地主張，不穀澈底和不穀積極來提倡輸入和攝取西方文化。歐西文明，確是整個的，文明史家也叫歐西文明爲一個文明集團（Civilization-Group），歐洲的國度民族雖有許多，但講到文化則一，同時這一個應屬全人類的新文化正是蔓延他洲，自動的或被迫的征服他洲，這也人人知道的事實。現在主張接納這一個人類的新文化的理想和要素，來根本改造中國和東方的，就是「全盤西化」（Total westernization or westernization as a whole）和「澈底西化」[Thorough westernization]的理論（Theory）。凡是界說，斷無可以得到一個盡善盡美的，但是我們爲研究和明瞭一種理論

的便利計，也不妨努力于得到一個較為完滿的名辭和界說。我以為用「全盤西化」這個用辭的優點，或可以說在注重輸入文化時，理論上要將外來文化的各種主要不可少的要素 (Essential elements)，應有盡有的，完整平勻的，形式內容兼備的輸入。實際上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平勻的輸入，這就是要有常識和整個的計劃；譬如輸入民權，也要輸入人權，輸入革命，也要輸入憲法，輸入男女的交際，也要輸入西洋的禮教和道德，要輸入 Shaw，也要輸入 Chesterton。從應有盡有和包容的 (All-Inclusive) 方面來看可說「全盤西化」，從理想和標準方面來看，可說「澈底西化」，主張「全盤西化」當然包括「澈底西化」在內；然而又因為中國人講革新時常有打折扣的危險，所以標出不折不扣的「全盤西化」為適宜。我們着眼于世界新舊文化，由突衝而達到完整狀態 Integration 的過程，揀擇一個至為普通的流行語，如「全盤」如「澈底」來說明一種學問上的理論，正如十八世紀英國哲學者柏克利 Berkeley 所說：「我們要同學者一樣思想，要同俗人一樣說話」(To think with the Learned and speak with the vulgar)；我的意思，以為用語上和理論上，不見得有甚麼不妥當。比

較其他的主張，絕不嫌其太籠統，事實不容許這理論的籠統含糊！因為「西化」過程中的主要事實（Essential Facts），截至今日止，是十分確定的。牠的體系和輪廓，雖經過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及假定將來蘇俄的總成績對於人類的貢獻和價值經過最後的估價後，恐怕會無多大更變。那些非難「全盤西化」理論為籠統，紊亂，矛盾，危險的論者，我以為尚未盡先認識好關於西洋文化至低限度的事實的責任，並會在我們的革新運動的過程中，生出許多不需要的流弊和危險！

我以為反對「全盤西化」的各派別的論者的最大弱點，是他們不大認識人類的文化，從牠的體系而言，只有程度高下的分別，而無種類的分別；現在只有較高的文化和較低的文化化的分別。就是新文化和舊文化的分別，嚴格而言，無東西文化之別。所以較高的文化體系裏頭所具有的要素和價值，必為較低的文化體系中所缺乏，所以被叫做較低文化，補救之法，只有較低的文化體系自動的或被迫的「全盤接受」和攝取較高的文化體系中的要素和價值，方可延長和發展牠的生命。種類上較高的文化和較低之文化，原無折衷之可言，要

滿足人類關於「行」的慾望，舢板小舟永遠無資格和大小汽船講甚麼折衷調和，講到政治思想，如張之洞的官權主義和總理的三民主義，無折衷調和之可言。事實上復古派也可，折衷派也可，其危險處在於因為不肯徹底的更新，連守古的能力弄到也會失掉。今日我們中國人要研究或欣賞自己的「國粹」和「國寶」，或想一發「思古之情」，我們的好東西被珍藏得最安全或最完備的處所，豈非倒要到歐西的圖書館，博物院，家庭的桌上，華貴婦人的身上去找尋嗎？我們想起來，也要警醒了。但是我們今日無法能否認這類的事實！所以我的意見，倒以為我們要是想自己發展自己「民族的個性」，養成一種能適應今日的生存，能「安內攘外」的「民族意識」，又有餘力來做「保存國粹」和「保殘守缺」的工作，則只有澈底的先走「全盤西化」一條路，其他的路，恐怕走也無多大效果。這也有許多歷史的明訓，明眼人自知，現在可以不必多說了。

在這回的論辯，對於「全盤西化」的主張的非難，似乎最激烈地挑戰的，是張謇先生所代表那種「經濟史觀」的立場。這種理論，也有人叫做「唯物辯證傾向的社會主義派」（見華

年週刊三卷十二期天貺君通信「文化論戰中的廣州」一文（以別于天貺君所叫做「代表新興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派」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論。這種思想，本來是俄國革命後中國裏頭表同情于蘇俄的理想和制度的人們的最流行的言論。我們對於俄國革命後成績和蘇俄的理想和制度，公平的估價，將來人類自有定論。但是中國十餘年來傾于「左向」心情的人們，對於蘇俄的認識，我們的批評恐怕要說大多數不能免于「一知半解的吶喊式的宣傳主義和武斷主義，對於蘇俄而具有較深的研究和認識和具有志願與無產者共生活同甘苦的真誠的人們，尚未多見。這也恐怕不是太過之言。他們的流弊，會弄到只習慣了一種無甚意識的吶喊和謾罵來唱如：

「你是中國的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中國沒有封建勢力，沒有外來的資本主義，不會有你……………！

等老調子。

但是我們要怎樣才可以勝任反抗封建勢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我們有怎樣的力量

，用怎樣的方法，來作反抗；和現在世界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而歐文化本身有無力量自己去改造等繁複的問題；恐怕我們「左向」的心情的人們那樣簡單武斷式的知識和方法，是不能領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達到安全的路途上的。民十四正當我們「反帝論」「反帝運動」至爲熱烈的時候，倒有人也很激烈的這樣說：

不愛中華民國，國必亡！……拒絕現代的文化，國必亡！要不亡國，除非由有腦筋的人們盡力去做「喚醒國人」的工作，使國人把這種亡國的心理反過來。

我以爲這些主張用「現代的文化」的力量，來反抗或改造帝國主義，比較上還來得高明些；事實上，比較澈底「西化」的人，也必然是不會「在洋大人的膝前跪倒」（俞平伯語）的人；而且我們的力量，也還可以做得到。

講到蘇俄的問題，本來是很繁複的，要等專家來應付；但是和「全盤西化」論生出關係的方面，也不是那樣的難于解答。我們稍爲用心讀歐洲的歷史，自然知道俄國乃是一個僅半「歐化」的國家，國民教育不普及，文化亦低。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是有牠的歐戰後特殊

機會。我們不能強人人去學牠。但是牠有牠的長處和短處，有心研究，自能看出，現在不必詳細的論列。但我這裏的很簡單的結論，以爲牠的文化，我們可以借用牠的沙皇時代的資本主義有人叫牠做只及成年的資本主義 Adolescent Capitalism 的名辭，叫牠的文化做只及成年的西洋文化 (Adolescent European Culture)，就是一個至多「半西化」和半「西化教育」的國家，也很適當。因爲俄國人的靈魂，未曾受過西歐歷史上幾個大運動的影響——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等。所以有人批評俄國的領導階級和青年們的思想，這樣地說：

「一個共產黨人，是一個俄國東正教的僧人，曾受過西歐的唯物主義和無神主義的興奮和惑亂的人 (The Bolshevik is The Russian Monk Excited And Confused by Feuerbach's Materialism and Atheism)」——馬塞克 Masaryk 語。

我以爲這句話，是一個一生研究俄國的事情的西斯拉夫人，對於蘇俄的文化，思想，教育，領袖階級的一個很的當的描寫和批評。因爲一個新社會，和新文化的建設，斷非可

以神跡地一朝一夕地用幾個革命口號，可以突然創造成的；革一個名字的命，是甚容易的事，但革大多數人民生活習俗的命，是不容易的；所以「舊東西」常常掛着「新名詞」很快的回來。我們談新俄國，不可忘記牠的仍然負着一套沙皇主義的遺產(Tsarism)。

所以蘇俄和社會主義的試驗，將來由實驗得來的成績和優點，西歐文化或個人主義經濟組織的國家，不愁牠無方法去容納，但蘇俄的文化，斷不能說已經根深蒂固地具備了西歐文明的重要元素和價值。所以我們仍然一樣地要繼續主張「全盤西化」。實際上，今日的蘇俄，豈非仍源源輸入西歐的技術和人材，來大大的建設嗎？有時想要資本，或外交上的便利，對於從前教授我們用口號來打倒的帝國主義國家，又豈非又會時送秋波嗎？但是牠究竟至少有大彼得遺存下來的「半西化」遺產，比較我們的吃虧還少。我們就不可不覺悟了。我們的理論就是：「全盤西化」可以包括蘇俄，包括社會主義，但蘇俄和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制度，不能包括西歐文化的要素，這是很顯明的道理。

今日中國所需要的新文化理想和新文化生活，所應該急起直追的情形和需要，和三十

年前實在一樣；不同的地方只須無遲疑地更澈底地『向西走』：這就是『全盤西化』的主張。我們更要虛心學習和認識西歐文化的要素是甚麼？牠對於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究竟有甚麼永遠價值？爲甚麼緣故值得人類用很大的犧牲來保護？我們要是仍主觀地不理會事實——至爲常識的事實，而空嚷着和幻想着人類的烏托邦的天堂，已經于蘇俄革命後，或中國的五四以後，來臨了這個世界，令到思想上社會上發生許多紛亂和矛盾，有甚麼益處呢？

現在我想對於西歐文化的理想和成績，試做一個估價的嘗試。

我們如果願意做一個公平的評判者，我以為我們不能否認：比較的現在世界上，『人』的價值，或『生命』的價值，究竟在『西化』的地方較爲高貴；所以我們說，西洋道德的基石，是建設在『個性』和『人格』的概念之上；所以有種種關於『自由』『平等』的學說發生；好好地做人的自由和權利是平等，國家的法律保障人民用訴訟的手段來得到公道（Impartial Justice）是平等，人民謀生，職業，教育等等的機會日就平等；官民平等，而非官尊民卑，男女平等，一妻主義，而非男尊女卑；自由並非亂幹的自由，乃容許人人有爲善和合理

地做人的機會的自由。我們吶喊了「自由」「平等」，年數已不少，然而貨真價實的「自由」，「平等」，中國是不再需要的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有人以為應該解作要在養成獨立自尊，歡喜自助自治，願意自己打理自己的事情（Self Management）的人；牠未必一定要和「小資產階級」主義同一塊兒的。這種主義的結果，也未必會令到對於社會觀念和責任觀念不強健，現在我們還需要不需要呢？「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政治，現在時興的人們以為太陳舊和軟弱了！太時代落伍了！但是西方仍然有許多人以為「德」先生的缺點，更要用更澈底的「德」先生來救治牠，因為「德謨克拉西」的政治，終歸能夠滿足大多數「平常人的平常快樂」（Common happiness of ordinary Folk——G. D. H. COLE——），而真正民治的意義，又未必只是「多數政治」，其理想是在於「多智政治」——就是用公開討論的方法對於大多數的幸福得到最好的意思或政策來治國的政治，也可以說用「公善」（Common good）和「公意」（Common will）來治國的政治，我們將來須要運用許多好法子來得到好結果，但是「民治」，「法治」的思想是永遠不會離開文明的世界的！而強健的人民自治的自由

團體，日漸成爲國家主要的成分。對於過去不太習慣于此種思想和制度的東方人，我們如還想「迎頭趕上去」，我們還須要大大的講求和努力吧？講到「西化」地方的人民生活裏頭物質社會精神上各方面的狀況仍然還較好：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健康上壽命上死亡率上等等的表示；一般人民經濟生活的提高，奢侈生活的限制，物質享受上的日就公平化，大多數人民窮極也無像我們那樣窮；教育的較普遍平等化；社會秩序的安全，對於意外的天災人禍：如水，旱，火，戰爭，疾病等的事前防禦的責任；合理的社會紀律；對於一切社會病：如貧窮，娼妓，酗酒，犯罪等的科學的預防與救濟，刑事行爲及其惡影響的預防和制止；風俗上，能在金融資本主義爲法律所認許的社會中，人民「拜金」精神和事事講實利的思想較輕，真實人情的普通；科學慾，學問的求知慾，理想慾[idealism]的較強，而不康健的好知慾的減少；智識價值的受重視；公民的責任心，從公精神，信義習慣，勇于守護「公善」和「權利」和反抗強權壓迫的舉動；合理的道德；利他主義和人道主義；文明世界裏奴隸基礎 (Slave Foundation of Civilization) 的崩潰，乃一八三三年英人犧牲二千萬英金

鎊的鉅款和美人南北戰爭鉅大人命的犧牲所最後造成；其他一切有榨取性的行為和事業，日受人輕視和消滅。總之我們現在不能否認比較上「智」和「勇」于爲「仁義」的民族，還是「西化」的民族；較爲不利害打算的愛真理愛原則愛理論，就是希臘人所說的「純理」Pure Reason，愛「尊重人當做人」(Respect For Men as Men，「人對於人的義務」)(Obligation of Men To Men)，而信理性終歸克服無理性不人道的一切鬭爭和犧牲！這恐怕就是「文明」之謂；以上種種，我們似還在不能不大事努力講求的時候。我們傾向于「左向」的心情的人們還要記得，能容許馬克斯列寧們生涯的大部分比較自由有生命地來著作活動的地方，還是要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國度，這是甚麼緣故，也要研究一下。

我不厭詳的這樣枚舉我們很容易忘掉，但不能不正視和領會的一點「西洋世界的社會學」的常識，無非想我們較爲具體的明瞭所謂西洋文化的狀態，是甚麼樣的，也可以說，文明狀態(Civilized State)或「文明化」是甚麼樣的。而且今日的亞洲，或未大「西化」的地方，在「文明化」的路途上，路程尚未行得很遠的時候，就算只爲着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幸福

計，從各種物質上精神上國內外的奴隸苦況中謀解放謀自由計，我們也不能說現在已不再需要『向西走』的方法。

不但我們中國還要『向西走』，日本也還要『向西走』，二十世紀遠東問題的合理和滿意的解決，還是要靠較為使人滿意的西方的『王道』主義，就是在十七八世紀由西方產生講人類應該『自由』『平等』的相待的那種主義，才能夠解決遠東現在很嚴重的人民生活上內政上和國際上的種種困難問題。現在這種理想主義的重心和力量還是在西方，我們不可不注意。去年日本的外交家石井菊次郎到美國遊說，有『日本在遠東係西方文化之担旗者，日本深信其有維護某種理想與制度以抵抗混亂潮之責任，太平洋之和平決不致搖憾』之言。日本今後的國策，果能真實的循着，『西方文化之担旗者』那一種志向比較過去更澈底的努力

西化和文明，我們不但爲遠東的將來表示讚許，爲日本國家的將來，也值得要歡迎。

但是日本人中因爲讀了千幾年中國古書的緣故，七十年來雖然比較我們的『西化』澈底，仍然『誇大，茫漠』（主張『西化』的日本人說的）的思想上的惡習，不能免掉，所以現

在還有很多不對和有危險性的思想。舉一個例來說，他們近年來對於西洋文化常有類這樣的思想的表示：

『東洋文明：家族主義；以愛情爲基礎；精神主義；協和的；共存共榮的；政治上主張王道；崇高的；

西洋文明：個人主義；以利害爲基礎；物質主義；鬥爭的；弱肉強食的；政治主張霸道；低劣的；

中日民族性同崇精神文明，政治以王道爲基礎，大家宜互相諒解，排斥西洋個人主義的霸道，使達于共存共榮的境地。』（見廿三年三月二日民國日報黃花）

這樣的見解，可以說是完全主觀的見解，無人可以認爲對的。但是現在的國人中和我們的留學生中，有意或無意的也會常有類此的腔調，所以弄到新文化論中，常有復古和不徹底的折衷派傾向的人，無怪日本也是一樣。足見東方只在至低限度的思想上還要繼續更完全更徹底的「西化」，何況文化的其他方面？所以我們說，七十年來「西化」頗有成功的日

本、理想和事實上，也還更要『全盤西化』，才能夠希望滿意的解決國民生活上——其實未曾經過『西化』的地方，無『國民生活』之可言，和國際關係上種種的問題，中國的應該怎樣來謀自存謀進展，也就不必再辯了。我們也可以說，今日日本會自己害自己的危險思想，是全由于不澈底的『西化』所致，牠的希望和遠東將來的希望，便在更『西化』之途徑了。我們稍爲研究下日本，也都知道，今日日本國民裏頭，也有不少知明之士，是見到這重要的道理，日本知識界和政界中，也有不少主張『西化』的思想遠過于我們曾在那裏留過學的諸先生，我們也要知道。

自從甲午之後，戊戌年間，智識界如嚴又陵，對於東西文化問題，尙敢在上皇帝的萬言書裏這樣說：

「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闢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于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儼然不終日

之勢矣！」

生活于立憲君主國度中的日本學者的對於西洋文明，尙能有這樣的言論和了解：

「人或謂泰西重個人而薄視國家，泰東重家族而薄視個人，是皆得半之見也。泰西文明之有今日，實個人主義發達之所致；其倫理，其藝術，其文明，皆以個人爲絕對的價值；而國與社會之價值，皆立於此有價值的個人之上，故自由之義昌，而文明益進，至其愛國公共心未嘗衰也。中國人印度人家族之觀念重，家族以上之愛國心公共心則缺然；而個人主義亦不發達，文化不進，職此之由。是知發達個人之自由，與人格之觀念，此吾東方今後之急務。彼視個人主義爲利己主義者，可謂大惑者已。」（浮田和民著「新道德論」：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譯本。）

我以爲他們當時說得很對，對於今日也還對。則今日對於我們民衆的思想和生活，會生出影響或負有責任的人們，和去做「喚醒民衆」的工作的人們，更要好好地再考慮我們中國的「西化」問題了。更希望此篇文字，能對於「全盤西化」的意義和理論，使更明瞭，對於

西歐文化的本質和價值，能引起較深的認識和研究，使

「中國往何處去」(Whither China)？的一問題，能得到較正確的回答。

二十三，四，八，嶺南大學

附錄文化論文要目

茲將此次在廣州民國日報現代青年欄發表的文化論文的主要目，臚列於左，以便讀者查考。（以發表先後爲序）至於在廣州其他刊物所登載的此項文字，亦有多篇，現爲篇幅所限，只得從略。

中國文化之出路

陳序經博士演講 現代青年欄 民國廿三年
梁錫輝筆述 廿六至廿七期 一月十五、十六日

爲中國文化問題進一解

謝扶雅 八三一期 一月廿二日

中國文化之死路

張磬 八三四期 一月廿五日

爲中國文化問題再進一解

張磬 八三六期 一月廿九日

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

陳序經 八三六期 一月廿九日

中國文化的生路與死路

陳安仁 八三七期 一月三十日

評陳序經先生的「中國文化之出路」

王峰 廿七至廿八期 一月卅一、卅二日

中國文化問題

祝伯英先生講 八三八期 一月卅一日
焯英筆記

評陳序經博士論中國文化之出路

林 潮

三八至三八期 一月卅二至二月二日

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

張 馨

八四〇期 二月二日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和徹底的西化』的批評

馮恩榮

八四九期 二月十五日

東西文化之分析

王衍孔

八四九期至八五〇期 二月十五至十九日

文化問題中的幾個具體問題

何汝津

八五一期 二月十九日

中國文化的特質

穆 超

八五三期 二月廿一日

西洋文化之本質

馮恩榮

八五三至八五四期 二月廿二至廿三日

編 後

本集子雖經校對數次，然錯誤的地方，仍恐不能完全避免。讀者如發覺其中錯字或排錯之處，希望原諒。

